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7)上



世界五千年
影响人类历史 200 件大事

隋朝的统一

刘秀重建的汉朝即东汉一直延续了近 200 年。到东汉末年，大军阀董卓起兵发动叛乱，从那时起，全国分裂了近 400 年之久。其中发生许许多多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著名的三国故事就发生在那个时期。到了南北朝末期，经过长期的分裂之后，全国人民，包括各个边疆少数民族，都强烈要求重新统一，结束长期战乱不休、征战不断的混乱局面。

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也越来越具备重新统一的条件了。

首先，在长达 400 年的分裂战争之中，士族门阀的势力渐渐地衰落下去了。这些士族门阀曾经显赫一时，控制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到了南朝刘宋政权时期，由于刘宋开国皇帝刘裕本人就出生于寒门，即中小地主家庭，他也感到士族门阀大多是一些好吃懒做只知游乐没有任何真才实学的寄生虫，开始限制他们的势力，而更多地任用中小地主出身的人做各级官员，即所谓的“寒人掌机要”。

至于北朝，由于少数民族掌权，士族地主的势力始终不如南方那样强大。西魏能够实行选拔贤良人才的政策，从反面反映士族门阀无力左右国家政治。

其次南北朝数百年间，由于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他们不仅共同生产，而且和汉族人民一道进行斗争。在经济生活方面、语言方面、风俗习惯方面，基本上和汉族合流。后来的历史家只能从他们后裔的姓氏郡望上来考知他们族姓的渊源。到了隋唐时期，氏、羌、鲜卑、匈奴、羯、氐等族的名称，终于成为历史上的名词。

第三，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原来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在汉族较高的文化影响下，进行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改革。如北魏孝文帝实行改制以后，北方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当时著名的农书《齐民要术》中所反映的生产技术的进步，是北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当时就有人在书中记载说“在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地区，老百姓的日子很富足，粮食基本上每年都能取得丰收。就连那些过去总是饥寒交迫的孤儿和年老体弱的人也不再吃那狗猪食，要饭为生的人也不再穿那牛马衣。”这段话说明，当时的北方确实比较安定，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生产确实是比以前大大发展了。有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加上民族的大融合，以及其他一些显著的变化，所有这些，都表明经过 400 年的长期分裂之后，国家重新统一的各方面条件都已经成熟了。

另外，在南北朝末年，北强南弱的形势早已成定局，建德六年（公元 577 年），北周出兵灭齐，很快统一长江以北各地。当周武帝伐齐的时候，陈朝大将吴明彻进兵夺取北齐的淮南。周灭北齐以后，立即伐陈，收复了淮南一带。这样，当时北周的疆土，不仅据有长江以北广大地区，而且包括长江上游各地（今湖北、四川）。在北周末年，周武帝已经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正由于这样，周武帝在世时，曾准备“平突厥，定江南”。很遗憾的是周武帝不久病死，完成全国统一的任务便落在隋文帝的肩上。

隋文帝杨坚的祖先是汉族人杨元寿，曾当过北魏武川镇的司马，住在武川。杨坚的父亲杨忠是鲜卑大贵族独孤信的部下，当年跟随魏孝武帝进了关中，尽心尽力辅佐宇文泰，当上了柱国大将军，封隋国公，任大宰相，掌握军政大权。杨坚的妻子是鲜卑贵族独孤信的女儿，杨坚的女儿又是周宣帝宇文

文赞的皇后，所以他又是周静帝的外祖父。杨坚不仅是关陇集团上层强有力的军事领袖，而且是皇亲国戚，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

周静帝宇文阐 8 岁称帝，杨坚在汉族大官僚的支持下入宫辅政，总揽军政大权，从此便开始为夺取帝位创造条件。

正当杨坚准备夺取帝位的时候，支持北周皇族的势力，便纷纷起兵，反对杨坚。首先起兵的是相州（今河南安阳）总管尉迟迥，与此同时，郢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今成都）总管王谦也先后起兵。杨坚针锋相对，派韦孝宽等反击尉迟迥，梁睿反击王谦，王谊等攻打司马消难，一举消灭了这三股反杨势力。然后，杨坚便大杀北周皇族。赵王招、陈王纯、秦王贇、曹王久、越王盛、代王达、滕王迪、毕王贤、汉王赞等，相继被斩首。北周宗室子孙死亡殆尽，周静帝彻底孤立。大象二年（公元 580 年），杨坚自称隋王。第二年二月，杨坚迫使宇文阐让位，杨坚即位，这就是隋文帝。改国号为隋，年号开皇。

在北方进行改朝换代的时候，中国南方的陈朝却越来越弱。陈朝宫廷里也在上演一场争权夺位的混乱闹剧。

早先，南陈开国皇帝陈霸先死后，传位给侄儿陈文帝，陈文帝死后，传位给弟弟陈宣帝，陈宣帝当了 14 年皇帝，他死掉之后，他的九个儿子都想当皇帝，但皇帝只能由一人当，于是这场争夺皇位的斗争就开始了。

陈宣帝在位的时候，已经立长子陈叔宝为太子。他的二儿子叔陵，四儿子叔坚都很不服气。叔陵是个伪君子，白天在别人面前装模作样地拿一本书看，晚上就又叫又闹，他被封为始兴郡王，负责江州、郢州、晋州的军政大事，他早就有篡位当皇帝的野心了。

四儿子叔坚的野心也很大。他被封为长沙王，掌管着一大片土地，在那里拉党结派，准备叛乱。

叔陵和叔坚的手下都有一帮亲信，每次上朝，他们两人争着摆阔气，讲排场，各不相让。在他们的唆使下，两家的家丁家将常常寻衅打架，危害百姓，闹得很厉害。

就在陈宣帝去世前一天，叔陵见父亲即将咽气，就对管理医药的人说：“切草药用的刀太钝了，你把它磨得锋利些吧！”第二天，陈宣帝一断气，叔陵就大声叫嚷：“快拿剑来！”他手下的人以为他要给皇帝举行送终的仪式，就赶快送进来一柄木剑。正巧木剑杀不了人，叔陵这才没能在那一天动手。

第三天，太子叔宝正扶着陈宣帝的棺材哭得很悲伤，叔陵突然操起已经磨快了的切药刀，向叔宝猛砍过去。叔宝的脖子上挨了一刀，马上昏倒在地。宣帝的柳皇后见叔陵行凶，赶快过来阻拦，也被叔陵砍了几刀，昏倒在地，叔宝的奶娘吴氏绕到叔陵背后死命地揪住他的胳膊，才使苏醒过来的叔宝得以逃掉。叔坚见叔陵杀叔宝，赶快冲上去，奋力夺下他手中的刀，仗着自己力气大，把叔陵一把揪住，拉到柱子跟前，用他自己的长袖子把他捆绑在柱子上。然后叔坚就去向太子叔宝请功，想乘机攫取大权，没想到等他一走叔陵用力挣断袖子逃走了。

叔陵逃到东府城，马上派人封锁了东府城和台城之间的通道，把监狱里的犯人放出来，发给他们武器，发动了政变。他自己披铠甲，登上东府城西门的城楼，招募百姓替他去争夺皇位，但军队将领和王公大臣们都不支持他，只有一千多士兵听从他的命令，愿意跟着他叛乱，寻找机会进攻皇宫。

这时候，叔宝因伤得太重无法指挥军队，于是叔坚就成了最有权力的人。叔坚派大将萧摩诃去带兵平定叔陵的叛乱。萧摩诃很聪明，先用计杀掉叔陵的两个大将，然后又带兵杀掉了妄图逃跑的叔陵。这样，一场激烈的争皇位的斗争才算最后平息下来。

至德元年（公元 583 年），陈叔宝登上皇位，他就是陈后主。陈后主是历史上有名的荒淫无道的昏君，他在位期间，陈朝一天不如一天，亡国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陈后主特别喜欢饮酒，而且每饮必醉；他不但自己饮，还要求大臣们同他一起大饮特饮，结果搞得朝廷上下一片混乱，大家都只顾享乐，根本不问政事；甚至连北方的杨坚准备打过长江消灭陈朝这样的大事也不愿意去考虑。

当陈后主君臣喝得烂醉的时候，杨坚已经准备灭陈。在陈后主即位的前一年，他就派大将韩擒虎任广州总管，进驻庐江（今安徽庐江）；贺若弼任吴州（今江苏扬州）总管，隔江钳制了陈朝首都为灭陈作准备。开皇八年（公元 588 年）年末，隋朝设置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今安徽寿县），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总体负责平陈的战役，并以杨广、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于是杨广从六合出兵，杨俊出襄阳，杨素出信州（今江西上饶），刘仁恩出江陵，王世积出蕲春（今湖北省蕲春县），韩擒虎出庐州（今安徽合肥），贺若弼出广陵（今扬州市），燕荣出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八路军队共计 51.8 万余人，都在杨广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大举攻陈。

当隋兵步步进逼的时候，陈朝边将上书告急，请求派兵防御，但陈后主却置之不理。陈后主说：“我有老天保佑，隋军即使来了，肯定也要被我打败。”大臣孔范自称文武双全，也说：“我们有长江作为屏障，隋军插翅也过不了长江，不许再说隋军的事了！”（《通鉴》卷一七六《陈纪十》）陈后主照常饮酒赋诗，听乐观舞。朝臣正忙于筹备元旦大庆，陈后主的亲信施文庆，是个只知讨好皇帝的坏家伙，唯恐隋军进攻的消息干扰了元旦大庆的准备，不仅不作报告，把战备工作也推迟了。

除夕之夜，皇宫里灯火辉煌，满朝文武围绕着丰盛的酒席，正在那里狂欢，陈后主喝得酩酊大醉，昏昏沉沉，紧急军事情报未拆封，便丢在床下。守卫采石矶军事要地的将士，也喝得东倒西歪。韩擒虎乘机率 500 人夜渡采石矶，一举全部消灭喝得大醉的陈军。元旦之晨，大将贺若弼又乘漫天大雾，偷渡长江，陈朝守军毫不察觉，隋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京口（今江苏镇江），直奔建康（今南京）。

当时建康还有十几万军队，兵力不算太少。但有能力的将领却得不到重用，如那个平定叔陵叛乱的能征善战的萧摩诃，听说贺若弼从广陵渡江攻京口，曾请求领兵反击，陈后主不许。贺若弼进攻钟山，立营的时候，萧摩诃再一次请战，陈后主仍然不同意。直到隋军进攻首都时，陈后主才允许萧摩诃出战。这时，不学无术的孔范也领一支部队混在军中。隋军在建康城下第一仗没打好，贺若弼登山观察形势，发现孔范的部队阵地混乱不堪。隋军集中力量先攻孔范的阵地。建康守军招架不住，大将任忠投降韩擒虎，并引隋军进了朱雀门。陈军准备抵抗时，任忠对他们说：“连我都投降了，你们还等什么？”结果陈军一哄而散。其他各地陈军也都投降，躲在景阳宫的陈后主出来，投降了隋朝。

隋朝平定南陈，结束了 400 年长期分裂的局面，中国重新统一。

在南北朝时期，有许多象杨坚这样以臣子身份夺取大权的情况发生，在众多的开国皇帝中，杨坚最有政治才能，而且在臣民中的威信也最高，所以他不但能够顺利地从前周小皇帝手中夺取皇位，而且有能力在建国后不久就派出大军南下，一举消灭了陈叔宝当皇帝的陈朝，统一了中国。所以说，隋文帝杨坚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做出的历史贡献最大。

隋朝从公元581年到至618年，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30多年，但是我国封建盛世的基础从此奠定，许多封建政治制度，也是从隋朝正式确定下来的。这些在以后的各个朝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朝的统一是在民族融合、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自从统一后，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治加强，朝廷上确定了三省六部的政治体制；地方上实行州、县两级制，合并了一些州县，裁减了多余的官员；创立了科举制度，用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吏；制定了新的比较简便的法律。

隋文帝能主动采取这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措施，主要是由于在他称帝以前，对后周的残暴统治很了解，他也知道主要是由于这些原因后周才亡了国。他当了皇帝之后，时刻告诫自己，要谨慎的处理各种政治事务，注意节俭。

他教训太子杨勇说：“自古以来，没听说有奢侈腐化而能长治久安的。你是太子，应当注意节俭。”他很注意皇亲国戚的行动，他们要是犯了法，也一律严惩。他的三儿子秦王杨俊，灭陈的时候立下战功，受到奖励。后来，杨俊生活越来越奢侈，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他指使手下的人放高利贷，敲诈勒索，使许多小官吏和老百姓倾家荡产。隋文帝听说以后，把杨俊手下的人抓起来几十个，杨俊胆子反而越来越大。他模仿皇宫建造自己的宫殿，用外国进贡来的香料涂抹墙壁，宫殿的墙上到处镶着镜子，还搜罗许多美女，日夜寻欢作乐。隋文帝知道了这些情况，非常生气，下令罢免了杨俊的官职，把他禁闭起来。将军刘升以为隋文帝不过是一时气愤，就去说情，他对着隋文帝说：“秦王不过是多花了些钱，把房屋修得稍好一些，这算什么大错？我认为陛下处罚过重了。”隋文帝严肃地说：“法不可违，不论什么人都得遵守国家的法律。”

过了几天，大臣杨素又来劝隋文帝赦免杨俊。隋文帝说：“皇子和百姓只有一个法律，照你们的说法，为什么不另立一个‘皇子律’？任何人犯罪，都得依法制裁！”

杨俊听说隋文帝拒绝了杨素的请求，又担心又害怕，就病倒了。病中，他给隋文帝写信表示认罪、请求宽恕。隋文帝对送信的人说：“我艰苦创业，都是为了他们，希望大隋天下，子孙万代传下去，他是我的儿子，反倒要把杨家的天下给我断送掉，我不能视而不见，一定要对他严加惩罚！”

没过几天，杨俊又惊又怕，竟然病死了。他手下人请求给杨俊立个石碑，隋文帝不同意，说：“想要留名，在史书上记一笔足够了，何必立碑！”随后，吩咐把杨俊府中奢侈华丽的装饰全部毁掉，并用这件事告诫其他人不可学杨俊的样子。

隋文帝对皇亲国戚、王子、大臣比较严，对百姓却比较宽。他认为，法律太苛，百姓就会反抗，法律和缓，百姓就会受到感化，自己的统治才能巩固。他废除了前朝的许多残酷刑罚。百姓有冤枉可以越级上告，直到朝廷。各地判了死刑的罪犯，不能在当地处决，一定要送交大理寺（最高司法机关）复审，然后由皇帝批准执行。这样一来，全国各地官员在判处犯人死刑的时候就谨慎多了。

隋文帝是以节俭著称的皇帝。有一次，他配止痢药，要用一两胡粉，找遍宫中也没有找到；又有一次，他想找一条织成的衣领，宫中也没有。他的车马用具坏了，派人去修补，不许做新的。他的节俭给其他人带了好头。平时，他留意民间疾苦，有一年，关中闹饥荒，他看到百姓吃糠拌豆粉，就拿来给大臣们看，责备自己没有治理好国家，下令饥荒期间不吃酒肉，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这样做就很不容易了。

为了巩固政治，加强中央集权，隋文帝创立了一系列新制度，并把那些过去行之有效的制度加以发扬光大。

首先，隋文帝改革了行政官制，废除北周的六官制度，建立起三省六部制。三省六部制是一种效率比较高的官制，此后的唐、宋、元、明、清各朝，基本上都是沿用隋朝的这种中央官制。接着，他又改革了地方官制。

隋文帝建国之初，曾经沿用一段时间北周的地方官制。这种官制把全国分成州、郡、县三级制度。三年以后他取消了郡，实行了州、县两制。这样一来，减少了一级地方政府，也撤去了许多无用的官吏；从而节约了大批政府开支，提高了管理效率。

自从西汉以来，州、郡、县的各级地方长官就有权自己选用自己手下的低级官员，不仅如此，而且当时许多地方官还掌握了兵权。隋文帝认为，这种地方官员权力过大的情况很不利于中央政府的稳定，所以，他规定，不论是不是地方上的一把手官员，任何官员都要由中央政府的吏部来任命。为了避免本地豪强地主把持地方政治大权，他又进一步作出规定：县佐不准任用本乡人士。这样一来，本地人更无法把持本地政务了。这些措施既改善了吏治，又加强了中央集权。

改革了官制之后，他又下令改革府兵制。府兵制是西魏建立的兵制。当时，宇文泰为了巩固自己地位，防止境内分裂，利用鲜卑族的血缘关系来维持他的部族混合体，于是便利用恢复鲜卑姓氏和赐鲜卑姓氏的方式拉拢各族将士。

到隋文帝掌权以后，正式下诏：“凡是改了姓的人，都要再改为原来的姓。”首先隋文帝自己废弃了普六如氏，复姓杨氏。接着，全国其他将领也跟着恢复自己原来的姓氏。隋文帝这样做，一方面争取了广大汉族的同情和支持，一方面又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削弱军队统领方面的分散倾向。开皇十年（公元590年），颁布了关于军人编入户籍的诏令，这是府兵制度的重大改革。西魏北周的府兵，一般是家属随营，不属州县管理，军队南征北战时，家属也跟军队调动。因此当时的府兵都是缺吃少穿的穷人。隋朝把兵户编入民籍，改属州县管辖，从此不再有兵户的存在，这就是说，府兵可以按均田令保有自己的土地或领受一份田地。隋文帝这样做，实际扩大了府兵的兵源，从而巩固了中央集权。这一措施，比前朝的那些做法进步多了。

制定新律。开皇元年，隋文帝即位不久，便令高颖，郑译、杨素、常明、韩俊、李谔、柳雄亮等制定新律。两年后，又令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这就是开皇律。

开皇律的体例很完整，包括到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的各个方面，以后历朝历代的法律，差不多都借鉴了隋朝开皇律的体例。其中，“十恶”之罪一直为以后的封建王朝引用。所谓的“十恶不赦”是指，凡是犯有以下十种罪行的人，永远不得赦免，即造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

孝、不睦、不义、内乱。

隋朝是一个封建王国，所以它的法律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贵族和王公大臣犯罪之后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赦免。上文讲到的隋文帝严惩儿子杨俊的事例只是个特殊情况。贵族、皇亲、功臣、大官僚等犯罪都可以根据平时表现减刑或免刑。一般官员有权减一等治罪和以铜赎罪。

隋律与北魏律相比，刑罚多少有所减轻，取消了宫刑、辕刑、梟首、鞭刑和孥戮连坐等残酷刑罚。另一方面，开皇律又除去死罪 81 条，流罪 154 条，及徒杖若干条，只保留 500 条，孥戮见于殷朝，连坐兴自商鞅，这种野蛮的刑罚，至隋朝废除了。

在律文以外，在诉讼程序方面，隋朝又制定一些有利于人民的制度。如人民有冤枉上告，假若县官不理，允许越级向州官上诉，直到朝廷。穷人虽未必能到朝廷上诉，但这些规定客观上起了保护人民的作用。九年以后，又敕令死罪犯人要经过三次奏请才决定行刑。总之，隋朝新律注意“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精神，即重罪轻罚，轻易不判死刑，比秦汉南北朝法律确有很大改进。

建立一个新政权之后，势必需要大批的人才来帮助隋文帝治理好这个国家。而上文提到的那些只知享乐的士族门阀子弟根本不懂政治，所以建国不久隋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士族门阀的权势，于开皇年间取消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用分科考试方式选拔官员。当时的科举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类属于临时的特科，相当于唐朝的制科，有“贤良、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科。第二种是常设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科。最初只设秀才、明经两科。秀才先试策，并加杂文。这些名目繁多的考试一直到清朝还在运用。

当时秀才科录取的标准非常高，每次考试及第人数极少，几乎成为虚悬的科目。所以，后来又增置了进士科，只试策，不考杂文，增加了录取人数。明经科只考《九经》，或贴经或问经义，及第人数较多。隋朝的那些有名气的人，如刘焯、王贞、杜正玄、杜正藏、许敬宗等都是出身秀才，房玄龄、侯君素、孙伏伽、杨纂等都是进士出身，孔颖达、韦云起等是明经出身。

以上这种种制度确立之后，隋文帝就把注意力放到贯彻落实上面去，他非常注意地方官的选拔，实施法治，严明赏罚。如开皇元年，他专门下诏表扬岐州刺史梁彦光，后来又表扬相州刺史樊叔略、新丰县令房恭懿。开皇十一年，因临颖县令刘旷的考绩名列天下第一，被升为莒州刺史。五年以后，汴州刺史令狐熙，吏部考绩第一，赐帛 300 匹，布告天下进行表扬。齐州的官员王伽，执法认真，关心群众，使归家的罪犯自己按期到京城报到，这件事感动了隋文帝，他立即敕令全国官员，学习王伽的榜样，叫各级官员以诚待民，努力工作。

隋文帝经过许多年坚持不懈的制度建设，终于稳定了政权，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了使国家更加强盛，人民生活更有保障，隋文帝还实行了均田制，注意减轻农民的负担，并组织农民大力兴修水利。其中，尤以均田制对发展农业的作用最大。

隋朝的经济发展和均田制有密切关系，当时的均田制度大抵沿袭北齐，农民所受土地，分为露田和永业田两种，露田要归还，永业田不还。丁男受露田 80 亩，妇女受 40 亩，奴婢按成丁受田，一头牛受 60 亩。每丁受永业田 20 亩，种植桑麻。官僚地主所受土地比农民多百倍，最高达一万亩永业田，少的也有两千亩。此外，他们还有职分田和公廩田。灭陈后，这个制度推行

到江南。

在“均田制”执行过程中，农民虽然不能得到规定的那么多田地，但是这种制度多少可使无地农民得到一些土地，地主对土地的兼并也受到一些限制，从而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全国耕地面积增加很快。

灭陈后，当时，全国垦田面积只有一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经过 20 年的努力，到大业五年（公元 609 年），增加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零四十顷。这个数字虽然不科学，但仍然能够反映耕地面积激增的趋势。

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隋文帝也做了大量努力。首先，他缩短了农民服兵役和徭役的年龄，从原来 18 岁开始服役推迟到 21 岁开始服役，并且规定年满 50 岁的人可以只交钱不服役；其次，减少农民的服役时间，规定男子一年只需为国家服役 20 天。这些措施，保证了农民有足够的时间用于农业生产。

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国家的财力也迅速增强，开皇 12 年，隋文帝看到国家的仓库都堆满了粮食、钱币和布帛，便下令减免农民三分之一的田租。这件事充分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的确是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隋文帝时期促进生产发展的另一个得力措施，是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开皇二年（公元 582 年），开渠引杜阳水灌三畹原，使数十万亩土地得到灌溉。开皇四年（公元 584 年），开广通渠，引渭水直达潼关，漕运 300 里畅通无阻。

农业的发展必然促进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这两方面，隋文帝也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为了理顺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加强对商业的管理，隋文帝时统一了货币。早在南北朝时期，钱币制度极端紊乱，南朝有五铢、六铢、鹅眼钱，岭南诸州利用盐米交易，不用货币。北齐用常平五铢，制造甚精，可是市场上流通私钱，种类也很繁杂。北周使用永通万国钱、五铢钱。隋文帝即位以后，逐渐废除以上各种旧钱，另行铸造一种五铢钱，作为标准货币，通行全国。不合标准的货币，禁止流通。开皇九年（公元 589 年），全国统一以后，便大规模铸钱。当时在扬州设五炉、鄂州设十炉、益州设五炉，由政府出面铸大量五铢钱。文帝时法治严厉，基本上统一了货币。

其次，文帝时期统一度量衡。南北分裂期间，度量衡紊乱不堪。开皇年间，规定以古尺一尺二寸为一尺，以古斗三升为一升，以古秤三斤为一斤。冀州刺史曾制定铜尺铁尺，放在市场作标准。后来隋文帝把冀州的度量衡在全国推广使用。

商业的发达必然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当时最繁荣的城市是西京长安。长安城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又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内置东西两市，东市名叫都会，西市名叫利人，这是长安的工商业区，这儿聚集了许多国内外商人。

除了首都以外，东都洛阳也很繁华。这个城市位于黄河和通济渠的汇合点，是全国水陆交通中心。洛阳设有三市，东市叫丰都市，南市叫大同市，北市叫通远市。通远市紧挨着通济渠，周围 6 里，商旅云集，停在这里的船只数以万计。丰都市周围 8 里，市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洛阳不仅是国内著名商业城市，而且又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据点。另外，四川的成都，也是相当繁荣的繁华都市。那儿各种货物云集在街市之中，拥挤得连行人走路都很困难。

隋文帝把国内的政治制度、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一件件地处理好之后，

又开始用心处理与少数民族突厥的关系。

突厥是北方的一个民族，他们的首领称为“可汗”，相当于中原王朝的皇帝。当时，共有四个可汗：沙钵略、阿波、达头和贪汗。其中势力最大的是沙钵略。

过去，为了避免突厥入侵，齐、周两个王朝争着讨好突厥，把中原的大量财物送给他们，他们还是劫掠边境，杀害平民百姓。隋文帝即位以后，除了正常的往来，不再送礼物给突厥。沙钵略非常不满。沙钵略的妻子千金公主，是被隋朝灭亡的北周赵王招的女儿，她经常怂恿沙钵略为自己的娘家报仇。当隋朝的一个地方官高宝宁起兵叛乱的时候，沙钵略便和高宝宁合谋，攻占了临渝镇（今河北省山海关）。接着，又出动40万大军骚扰隋朝的北部边境。

隋朝刚刚建国，北周的旧臣心怀不满，南面的陈朝派兵攻掠江北。北面又受到威胁，形势十分紧张。怎样解除突厥的威胁？隋文帝冥思苦想，一筹莫展，很伤脑筋。

一个叫长孙晟的大臣乘机上书说：“达头和沙钵略力量不相上下，但是地位没有沙钵略高，他们之间有矛盾。只要稍稍鼓动一下达头，他们就会互相攻击起来。沙钵略有个弟弟叫处罗侯，因为势力小，没当上可汗，跟沙钵略不和。阿波也不是真心拥护沙钵略，只是看谁强就听谁的。我们应该联合弱的攻打强的，派使者和达头结交，联络阿波和处罗侯。这样，沙钵略势必左右分兵防守，势力肯定显得单薄。等他们互相怀疑的时候，我们再找机会起兵把他们全都消灭掉。”

隋文帝听了长孙晟的话之后，大为赞赏，马上决定采纳了长孙晟的谋略，派遣使者联络达头，赠送绣有狼头的大纛，表示对达头的尊重。沙钵略得到这个消息，很不放心，派使者到隋朝探听虚实。正赶上达头使者也来访问，隋文帝故意让达头使者坐在上位，给他们制造矛盾。沙钵略听说达头和隋朝关系这样密切，更加疑心，连忙派出军队戒备达头，并准备进攻他。

隋文帝又派长孙晟去联络处罗侯。处罗侯为人很聪明，也很有心计，他知道自己力量还很薄弱，不敢和哥哥沙钵略争夺汗位。他一面争取族人的拥护，一面和中原王朝拉关系，在这之前，早已和长孙晟秘密结成了联盟。这次长孙晟来访，正好联络隋朝求得支持。长孙晟表示隋朝支持他争夺汗位，希望他实践从前的誓言，与隋朝同心合力进攻沙钵略，处罗侯满口答应。

消息传到沙钵略那里，他更加怀疑处罗侯要篡夺他的权力，连夜派兵加强戒备。这样，沙钵略和达头、处罗侯之间互相猜忌，矛盾更加尖锐了。隋文帝的目的达到了。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沙钵略和阿波可汗分兵八路进攻隋朝，阿波被隋朝打败。长孙晟对阿波说：“现在达头和隋朝友好，沙钵略就不敢欺侮他。可汗这回打了败仗，沙钵略一定要怪罪的。请可汗想一想，能打得过沙钵略吗？不如依附隋朝，联络达头，壮大自己的力量，何必受沙钵略的欺侮和杀戮呢？”阿波听从了长孙晟的劝告，派使者到隋朝订盟和好。

后来，沙钵略也被隋朝打败了，他听说阿波和隋朝和好，就去攻打阿波的住地，阿波向达头求救，达头和阿波联合攻打沙钵略。贪汗也出兵援助阿波，四个可汗打得不可开交。达头、阿波、贪汗等四部势力都宣布独立，从此，突厥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更有利于隋朝分别解决他们了。

隋朝用远交近攻、扶弱抑强的策略，专门攻打沙钵略。沙钵略屡次被隋

军打败，力量渐渐衰弱下去。而阿波在不断的战争中，渐渐强大起来。沙钵略受达头、阿波的威胁，提防契丹攻击，又担心处罗侯夺他的大权。四面受敌，走投无路，只好派人去向隋朝求和。千金公主也不再想着报仇了，表示愿意做隋文帝的女儿。

开皇四年（公元 584 年），隋文帝派虞庆则、长孙晟出使东突厥。沙钵略听说虞庆则、长孙晟要来，他下令卫队在帐篷口的两侧列队，士兵个个刀出鞘，杀气腾腾，又在帐篷内摆上所有的珍奇珠宝，自己端坐在帐篷正中。虞庆则捧着隋文帝的诏书走进来，沙钵略动也不动，十分傲慢地说：“我们祖祖辈辈从来就没有向人家跪拜的习惯。”长孙晟非常严肃地说：“您与我们的皇帝都是大国的天子，您不肯给我们的天子跪拜，我们当然不能勉强。但是，您的妻子现在是隋朝皇帝的女儿，您就是隋朝的女婿，女婿能不拜岳父吗？”沙钵略见他讲得有理，没有办法，说：“应该拜，我尊命就是了。”于是跪接诏书。从这以后，沙钵略向隋朝称臣，成为隋朝的附属国，年年定期向隋朝皇帝进贡。这样一来，西北边境也就安宁了。不久以后，还在与突厥交界的地方开展贸易活动，用中原的粮食布匹来换取突厥的马匹和皮毛。

总结隋朝的开国史，可以看出，隋文帝对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推行均田制，减轻租税徭役，使经济得到恢复，户口增加，耕地扩大，粮食连年丰收，粮仓里都装满了粮食。纺织、制瓷、造船业更是发达，能造高百余尺的五层楼船。营建洛阳和开凿大运河的宏伟工程，既说明隋朝国力充裕，也说明当时工程技术已相当发达。

隋朝的民族关系，有斗争，也有和好，总的情况是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来往有了加强，特别在西北方更为明显。隋文帝对突厥的政策起了很大作用。中外关系主要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交流，经济文化交流都很频繁，东边与日本的来往比较密切。

隋朝文化以建筑艺术成就最大，赵州桥的修建，长安和洛阳的宫殿建设，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雕板印刷出现于隋末，医学上出现了探讨病因病理的著作。其中赵州桥至今仍然存在着。

由于隋文帝和他的大臣们励精图治，加上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从隋朝开国到开皇末年，只短短 20 年的时间内，社会经济和文化就发展起来了。隋朝虽然是个短命的朝代，只存在了 37 年，但却开创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为不久以后出现的大唐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说，隋朝的统一，意义是相当大的。

开凿大运河

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认真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改革各种政治制度，制定比较合理的刑法。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又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减轻农民的负担。隋文帝还比较注意节俭，一旦发现官员有贪污奢侈的腐败行为，都要严加惩处。他的皇子杨俊背着他在外面大造华丽宫殿，用黄金装饰屋顶，用美玉铺砌台阶；隋文帝发现之后，非常生气，马上把杨俊抓起来关了禁闭，结果杨俊病死在囚室里。经过许多年的努力之后，隋朝的经济恢复发展得很快，国家渐渐富强起来。

但是隋文帝是个容易轻信谎言的人，他立大儿子杨勇为太子之后，另一个儿子杨广千方百计想把杨勇废掉立自己为太子。就用阴谋把杨勇的名声搞臭，让隋文帝越来越讨厌杨勇。不久之后干脆按杨广的意思废杨勇而立杨广为太子。

杨广夺取太子的名号之后，野心更大了，他想早一点当上皇帝，就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父亲隋文帝，然后自己即位，杨广就是后来的著名的暴君隋炀帝。

历史上的隋炀帝是一个一直有争议的人物，许多人对他的残暴荒淫一再谴责、批判、指责，认为他是历史的大罪人。但也有不少人主张应客观评价隋炀帝的是非功过；因为除了他的残暴之外，隋炀帝还做了许许多多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业绩，如打击分裂势力，抵御边境侵犯，开拓疆土，开凿大运河等。其中，隋炀帝时期开通的大运河，一直到今天仍然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运河对于沟通南北经济文化的联系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早在两汉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是在黄河流域，北方的经济比南方进步很多。据司马迁说，直到汉武帝时期，长江以南的农业生产仍然是“采用刀耕火种的方式”。三国以后，特别是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由于长期战争，人民大量南迁，他们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南方人民共同开发富饶的处女地。经过几百年的开发，江南经济有了显著发展。南方经济发达地区，首推江浙，特别是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一带），成了士族门阀盘踞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土地“亩值一金”，其肥沃程度可与关中相媲美。但是，隋朝的政治中心在北方。而北方城市和边防军所需要的粮食，有很大部分要依靠江淮地区供应，依靠马车和人力车运输，不仅运量小，速度慢，而且费用很大，无法满足北方各地的迫切需要。利用水路运输，是当时最切实可行的办法。由此可见，尽早动工开凿大运河，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即使没有隋炀帝，这一时期必定也要开南北运河的。

从政治方面看，江南的阶级矛盾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始终是比较尖锐的。开皇十年（公元590年），江南大地主沈玄、汪华等聚众反隋，有的称天子，有的称都督。隋文帝派杨素调集大军，历时两年才平定江南的叛乱。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李英林起兵于熙州（今安徽安庆市），第二年，潮州少数民族发动起义。由于南方人民的不断起义，于是隋文帝下诏没收天下兵器，严禁私造。同时更禁止江南人私造大船，凡是三丈以上的船只，一律由国家没收。隋炀帝为了加强对江南人民的统治，于是下令开凿大运河，使南北运输畅通无阻。

除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因素之外，隋炀帝决定开凿大运河还有想到江南享乐游玩一番的因素。杨广早年曾任扬州总管，对江南盛景始终非常恋慕，

这从他留下来的大量咏江南风景的诗词中可以看出。他曾作过一首《春江花月夜》，诗的开头这样写道：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这首诗的确写出了扬州的秀丽风光。隋炀帝本来就是一名风流皇帝，说他想开凿运河以便去江南游玩，应该也是开运河的动机之一。

在中国古代，天子一般都有出巡的习惯，叫做“巡狩”，炀帝当然也有这样的打算。在开凿运河前一年，他曾对给事郎蔡征说“自古以来天子都有巡狩之礼，以前江南的许多皇帝大多贪恋宫廷的奢侈舒服的生活，呆在深宫之中，从来不走出宫门与老百姓见面。也许这正是他们灭亡的原因之一吧。”从这里可以看出，隋炀帝出游并不单纯为了享乐和游玩，还有深入民间了解民情的意图在内。

如果追根求源，最早动工开凿大运河的是隋文帝。他在位的时候，出于水利灌溉和漕运的需要，曾征发民夫引西边的渭水从大兴城到达东边的潼关，东西全长 300 里。这段运河开通后，隋文帝命名为广通渠。广通渠的开通确实大大方便了关中地区的物资转运工作。

炀帝即位，便积极动员人力物力开凿东南运河工作。公元 605 年开通济渠，下令征调河南、淮北一带百万民工，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入黄河，又从板渚（今河南荥阳东北）引黄河水入汴水，疏通茱荡渠故道，向东南经今夏邑、永城、宿县、灵璧、泗县，由盱眙对岸入淮水，再折向今清江市，达于邗沟。同年又征淮南民工十余万开邗沟，修整扩大前代故道，从山阳（江苏淮安）引淮水至扬子入长江。通济渠的开凿，直接沟通了黄河、汴水、淮河、长江四大水系，成为运河的主体部分。“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每两驿置一宫，为停顿之所。自京师至江都，离宫四十余所。”大业四年（公元 608 年）又征发河北地区男女民工百万余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自今辉县东北至临清，顺卫河经今天津至涿郡，长达二千余里。大业六年（公元 610 年）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长达八百里，河宽十余丈，沟通了钱塘江和长江水系。

历经短短的 6 年时间，开凿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长达 4800 里，是隋朝国力强大的具体表现之一。运河的开凿，虽然和隋炀帝个人有关，毕竟是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运河贯穿陕西、河南、河北、江苏、浙江等五省区，并连结这一地区各个水系，这样庞大而成系统的工程，对于加强国内经济文化交流很快便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据当时的史书记载，通济渠向西直通黄河和洛河，向南直达长江和淮河；隋炀帝每次巡幸，都从这条运河上经过，顺利到达扬州。中国东南诸省，如交歧（今越南北部）、广东、湖南、湖北、扬州、浙江等地区，都有商船到达这里，在通济渠上往来不绝。运河的开通带动了商业的空前发展，往日十分萧条的大运河两岸，商业都市日益繁盛，如运河南端的杭州，运河与长江交口处的京口和江都，运河与淮河会合处的楚州，运河与黄河相遇处的汴州等，都是人文、物资及商品交流荟萃的地方。当时的河北与江淮是全国重要经济区域，不仅农业经济有发展，而且手工业、商业贸易也有长足进步，人力物力基础雄厚，为运河开凿提供了必要条件。大运河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虽然有隋炀帝的贡献，但主要是当时各族劳动人民的智慧、才能和劳动的结晶，它同我国古代长城一样，享名世界，成为世界工程史上的奇迹，值得人们重视。

开凿大运河的过程也和修长城的过程一样，充满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可以说，大运河的每一处都是劳动人民用血汗挖出来的。当时，隋朝的统治者为了早日开通运河，对劳动人民特别残暴。为了开挖引洛水入黄河的工程，以及修筑北边的长城，一下子征调民工百万余人。男人人数不够，就用妇女充作劳动力，由于劳动强度太大，累死、病死、饿死的人占去一大半。

隋炀帝大业四年，朝廷下令征发河北地区百余万人开凿永济渠，男人数量不够，又把妇女拉来充役。当时督工的将军名叫麻祜，非常残暴，人们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害怕。沿河人民常用“麻祜来了”这句话恐吓小儿。隋朝统治者为开凿大运河，残酷地剥削压榨人民。从这方面讲，大运河是隋末劳役繁重的历史见证之一。

为了对大运河的开凿过程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应该分段说明当时开凿的情况。

首先开通的是通济渠。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征发河南、淮北等地区的一百多万民夫开凿通济渠。这条运河是利用古代运河渠道，加以拓宽的工程。从这年3月开工，8月完成，两千里的渠道只用了一百余天。如果是新开的河道，这样短的时间，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完成的。

通济渠的具体路线，是以东都的西苑为起点，然后引谷水、洛水入黄河。进入黄河后，利用黄河的一段河道直达板渚（今河南汜水东）。从板渚再引黄河水南流，使河水进入古鸿沟系统的睢水。这条睢水经过现在的中牟、开封、陈留、杞县、葵邱、宁陵、商邱、下邑、水城、宿县、灵璧、泗县，入泗水而进淮河。

在淮河与长江之间，隋朝以前有邗沟相通，但是到了隋朝，邗沟由于多次改道，河道狭窄，根本无法通行大船。隋文帝平陈以前曾下令治山阳（今江苏淮安）。但是隋文帝整治的是邗沟入淮的水口，并没有彻底清理河道。隋炀帝时期，组织十余万民夫，把旧有的邗沟拓宽取直，从山阳到达扬子（今江苏仪征），位置在邗沟的西侧，这次又把邗沟改直，不经过射阳湖而直通长江。

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凿永济渠。这条运河主要是利用自然河道，沟通沁水和淇水，引沁入淇，在武陟县北部会合，一直北流从天津入海。永济渠就是利用这条天然水道向北伸展，然后合永定河，北达涿郡（今北京）。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开凿南运河。在隋朝以前，长江以南的人民开了不少小河，这次开河主要是利用旧日的小运河，把小河拓宽。然后引长江水，穿小河，绕过太湖，以达杭州，便成了江南运河。这条河全长八百里，宽十余丈，是江南十余万人民的劳动成果。

这条运河北起涿郡，南达杭州，连开皇四年（公元584年）隋文帝命宇文恺率水工开的广通渠（自大兴城至潼关，长三百余里）计算在内，大运河全长2700余公里，是世界最古老和最长的运河，相当于苏联沟通伏尔加河和顿河的运河长度的26倍多。大运河不仅长度在世界运河史上是首屈一指的，而且河道的水深和宽度及其通航能力也是最大的。

大运河通航以后，对南北经济交流起了重大作用。运河是大业六年开凿的，第二年，隋炀帝就敕令把江淮粮食北运，并将江淮等地的战争物资通过永济渠输送辽东。因此唐朝著名理财家杜佑说：运河通航以后，“天下利于转输”。

大运河开通以后，对黄河起了分流作用。这是因为每年六七月间，黄河

流域雨量大增，黄河的流量骤然增长，而下游泥沙沉积，河床很浅，在河水上涨之际，容易泛滥成灾。但从开凿运河以后，每当黄河涨水季节，部分河水可以通过永济渠和通济渠泄出。这样一来，便减少了黄河本身的压力。因此，南北运河开通以后，数百年间黄河未发生大泛滥。

抛开劳动人民为开凿运河所受的苦难不论，大运河的胜利开通也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当然也在某些方面显示出开凿运河决策人隋炀帝的巨大气魄。南北大运河总体上一次设计，一次施工，一次通航，这在勘查测量、节制水量、平衡水位，利用天然河道和人工水道等各方面需要高超的科学技术水平。这种高超的水平，在世界运河开凿史上都是罕见的。

首先，在综合利用各种资源方面很科学。开凿过程中，利用挖河挖出来的土筑路、植树，在通航的同时，又发展了陆路运输，并保持不让水土流失。据文献记载，当时的通常做法是开挖四十步宽的河道，然后在两旁栽树，树的品种多选择杨柳之类的易于存活而且树身相对较矮的品种。对于这种具有深远环保意识的做法，当代学者也是赞叹不已。

其次，充分利用旧有航道。这是一种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开凿过程中，运河利用汉魏以来自然航运条件较好的旧有航道。以通济渠和永济渠为例，这两段都是利用黄河古道，向东南、东北作扇形张开，尽量利用黄河南北自然地形的特点，使运河顺应地形，由高向低缓缓流去。当时既利用了黄河南北水流的自然趋势，又沟通了不同水系之间的水路交通。

尽管利用古道修凿而成，民众仍然付出了繁重的劳动和宝贵的生命。

第三，为了减少工程量，尽量拉直河道距离。通济渠是呈直线型，路线经过板渚、郑州、开封、商丘、永城、宿县、灵璧、泗县、盱眙一线，全长大约 1500 里左右，是比较科学的长度。在开凿邗沟这一段的时候，也几乎是一条直线。这条运河既要穿越今天仪征地区的丘陵地带，又要截断今天安徽中部丘陵，如果选择的线路不当，很可能就通不了航。隋朝时所开的邗沟，是最早科学取水道的运河之一。

当然，要取直河道，就不可避免地强占民田，强拆民房，强拆城墙等障碍物。这也可算是隋末的一大弊政吧。但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少数人做出的牺牲，换来的是长期的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隋炀帝是个复杂的人物，他的许多历史功绩与他的残暴行为分不开。甚至一些本来有积极意义的事情，让他一干，反而成了祸害人民的弊政。

大运河是用无数劳动人民的血汗开成的。这项巨大的工程大约用了 1.5 亿个工，当时全国只有 890 万户，平均每户要出将近 20 个工。开通济渠的 100 多万民夫，死掉了三分之二。

运河挖成了，隋炀帝派去验收的人，把一丈二尺长的铁脚木鹅，从上游放下，如果木鹅停住，就说是水浅。在运河的一段中，木鹅停了一百多处。隋炀帝竟下令将负责挖掘这一段的官吏和民夫五万人全都捆住手脚，活埋在水浅处的岸上。

运河还没有修完，隋炀帝已经派人造好了许多大船。公元 605 年秋天，他带着大批随从，乘坐这些船到江都游玩。隋炀帝坐的船叫龙舟，长二百尺，分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二层有 160 间房，都装饰金、玉，下层是宦官内侍住的地方。挽船的人叫殿脚，龙舟有殿脚 1080 人。皇后坐的船有殿脚 900 人。随行的嫔妃、王公大臣、僧尼道士分乘几千艘华丽的

大船，纤夫共有 8 万多人。这支浩浩荡荡的船队，在运河中船头接船尾，前后长二百多里，旌旗蔽日，热闹非凡。

这样庞大的船队怎么顺利航行呢？那些专门负责游幸的官员征调来纤夫拉船，另外还有两队骑兵在河的两岸护卫着船队，到了晚上，船上和岸上都点上灯火，并且要鼓乐齐鸣，真是极尽奢侈豪华之能事。

为了满足船队大批人员的享受，隋炀帝命令两岸的百姓，给他们准备吃的喝的，叫做“献食”。那些州县官员，就逼着老百姓办酒席送去，有的州县，送的酒席多到上百桌。别说隋炀帝吃不了那么多，就连他带的宫妃太监、王公大臣一起吃，也吃不完。留下的许多剩菜，就在岸边掘个坑埋掉。可是那些被迫献食的百姓，却弄得倾家荡产了。

江都在当时是个繁华的地方，隋炀帝到了江都，除了尽情游玩享乐，还大摆威风。为了装饰一个出巡时候用的仪仗，就花了 10 多万人工，耗费的钱财更是上亿论万。这样整整闹腾了半年，又耀武扬威地回到东都来。

在江都刚住了 4 个月，隋炀帝又要回洛阳。这一次从陆路回来。于是，又要置办车马仪仗，又要制作百官仪服。各州各县都得贡献羽毛。老百姓遍地设网捕捉禽兽，也凑不够数，只好高价去买。买一只野鸡尾就要花十匹绢的代价。

以后，隋炀帝又两次巡游江都。他每巡游一次，沿途的老百姓就遭一次殃。而许多官吏却因为拚命搜刮百姓，向皇帝献厚礼，升官晋爵，发了大财。

打这以后，隋炀帝几乎每年出巡。有一次，他从陆路到北方去巡视，征发了河北十几个郡的民工，开凿太行山，铺一条巡行的道路；为了保护他巡行的安全，又征发了 100 多万人修筑长城，限期 20 天筑成。这样，他才在 50 万将士的护卫下，在北方边境上巡行了一周。北方没有现成的宫殿，好在隋炀帝身边的宇文恺是个巧匠，专门为他造了一个活动宫殿，叫做“观风行殿”。这种行殿上面可以容纳侍卫几百人，使用的时候装起来。不用的时候可以拆卸装运；下面装着轮子，可以随意转动。这在当时可算是一种发明，可惜只是供隋炀帝一个人享乐罢了。

隋炀帝最后一次下江都，隋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了，全国不断燃烧起农民起义的烈火。一天夜里，大业殿起火，隋炀帝惊慌万分，以为起义军打进来了，急忙逃入西苑，藏在草丛中，直到火灭以后，才敢出来。夜里睡觉，经常吓醒，要几个宫女摇抚着他，才能睡着。因为江淮地区农民起义军比较少，隋炀帝又想到江都去。大业十二年（公元 616 年）7 月，新龙舟造好了，他急忙下令出发。大臣们都不同意隋炀帝离开洛阳。有的官员上书劝阻他，竟被他处死。船队走到汜水（今河南省荥阳县），又有一个小官上表请求回京，隋炀帝杀了这个小官，继续前行。到梁郡（今河南省开封市）有人拦路上书说：“你真去江都，天下就不是你的了。”隋炀帝又把这人杀死。他对官吏们的进谏一概不听，决心去江都享乐。

到了江都，隋炀帝生活更加荒淫奢侈，每天大吃大喝，杯不离口。在农民起义的强大声势下，他坐卧不安，有时候在梦中也惊呼狂叫起来。有一次，他对着镜子说：“好头颈，不知该谁来砍它？”荒淫残暴的隋炀帝，已经预感到他的末日快要来临了。

除了征发大批民夫开凿运河之外，隋炀帝还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

公元 605 年，隋炀帝派管理建筑工程的大臣宇文恺负责造东都。宇文恺是个高明的工程专家，他迎合隋炀帝追求奢侈的心理，把工程规模搞得特别

宏大，建造宫殿需要的高级木材石料，都是从大江以南、五岭以北地区运来的，光一根柱子就得用上千人拉。为了造东都，每月征发 200 万民工，日夜不停地施工。他们还在洛阳西面专门造了供隋炀帝玩赏的大花园，叫做“西苑”，周围二百里，园里人造的海和假山，亭台楼阁，奇花异草，应有尽有；尤其别出心裁的是到了冬天树叶凋落的时候，他们派人用彩绫剪成花叶，扎在树上，使这座花园四季长春。

为什么炀帝要花费大量的钱财，不顾许多大臣的反对，急于营建东都呢？从政治意义上来说，是为了便于对关东和江南地区的控制，从更深层的目的来看，是为了更有效更迅速地镇压黄河中下游地区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隋文帝杨坚早就没收了江南一带三丈以上的船，又下令不准民间私藏兵器，其目的都是一样的。从经济上来说，即因关中物资，不足以供应统一后隋朝中央政府机构所需，洛阳地位适中，转运财物比较便利，路程也比长安缩短了，这在诏书中也指出：“洛阳地处中原腹地，交通便利，无论从水陆还是从陆路，都很方便。”况且自从北魏孝文帝迁都到此以后，洛阳的经济和社会都在不断地发展着。隋炀帝即位之后，继承了文帝留下的雄厚财力，加上当时社会比较安定，使他在各方面都具备了营建东都的条件。

东都的营建，经过约一年。隋朝役使工匠，极为残酷。主要是依靠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智慧，到公元 606 年（大业二年）初建成。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宫城是宫殿所在处，皇城是文武官司所在处，外郭城就是大城或称罗城，是官吏私宅和百姓所住处。外郭城内洛水以南有九十六坊，以北有三十六坊，还有东、南、北三市。特别是在城内和城外附近的地方，建筑了许多大粮仓如含嘉仓、洛口仓等，已见前述，在仓内储存了难以数计的从农民身上榨取到的粟帛，充实了隋朝的财力。且在建筑东都的开始，就迁移天下富户数万家到东都洛阳定居，大批豪族、富商迁到洛阳来之后，一方面削弱了地方豪强的势力，另一方面也增进了洛阳的繁荣程度。

所以，东都洛阳的建成，不仅成为隋炀帝时的政治中心，更是当时的经济中心，因此才会出现上面所述洛阳的那种空前繁盛的情况。尤其在南北两段运河开后，洛阳成为两段运河的衔接点，成为南北经济交流和物资集中的枢纽。

营建东都和开凿大运河这两项巨大的工程，虽然耗费了许多劳动人民的血汗甚至生命，但最终还是有巨大的进步作用的。这两项工程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本来完成这两项大工程之后，炀帝就应该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让老百姓好好安定下来生活一阵子，恢复一下被用得差不多空了的国家财力。因为连续多年的巡游，无休无止的劳役和越来越重的赋税，已经把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隋炀帝的骄奢淫逸的心理却越来越重了，为了炫耀武功，公元 611 年，他发动对高丽的战争，这是一场毫无进步作用的侵略战争。

高丽是我国东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早在汉魏时期就已经接受我中央政府的册封，实际上是我国的一个附庸国。因为距离中央朝廷距离较远，高丽政权经常自动脱离中原王朝的控制。所以，在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政权就时常与高丽政权发生冲突，高丽也是有时降有时叛。隋炀帝出征高丽的借口就是高丽政权不听从他的调遣。

这一年，他从江都乘龙船，沿着大运河直达涿郡，亲自指挥这场战争。他下令全国军队，不论远近，一律向涿郡集中；还派人在东莱（今山东掖县）

海口督造兵船 300 艘，造船的民夫在官吏监视下，日日夜夜在海边造船，得不到休息。他们下半身泡在海水里，时间一久，从腰以下都腐烂得生了蛆，许多人受不了这样折磨，倒在海水里死了。

接着，隋炀帝又命令河南、淮南、江南各地督造 5 万辆大车，送到高阳，给兵士运输衣甲、帐幕；又征发江、淮以南民夫和船只把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和洛口仓的粮食运到涿郡。于是，无数的车辆，无数的船只，不分白天黑夜，沿着陆路和运河源源不断由南向北，形成一支滚滚洪流。几十万运输物资的民夫，在半路上有不少累死饿死，沿路都是倒毙的尸体。由于民夫死亡太多，耕牛也被征发拉车，弄得田园荒芜，民不聊生。

人民没法忍受下去了。要想活下去，只有反抗。邹平（今山东邹平）人王薄，首先领导农民在长白山起义，他写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浪死就是白白送死的意思），号召大家反抗官府，歌中写道：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砍头何所伤？”歌词的意思是号召农民起来反抗官府的抓丁抓差暴行，与其被征发到辽东与高丽作战而死，还不如勇敢地拿起武器，与官军拚个你死我活。

王薄起义不久，山东、河北的广大地区也纷纷出现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隋炀帝仍不管这些严重情况，照样调派军队再次进攻高丽。

隋炀帝第一次进攻高丽，被打得大败。100 多万隋军兵士，逃回来的只有 2700 人。这样的惨败，并没有使这个骄横的暴君死心。才隔一年，他又发动了第二次对高丽的进攻，他亲自率领大军攻打辽东，派大臣杨玄感在后方黎阳督运粮草。

杨玄感的父亲杨素，原是隋炀帝的亲信，帮助炀帝夺取皇位。后来受到炀帝猜忌，郁郁不乐地死去。杨玄感为此对隋炀帝早就不满，这一回看到局势混乱，就想利用这个时机推翻隋炀帝。

杨玄感用督运粮草的名义，征发了年青力壮的民夫、船工 8000 多人，要他们运粮到辽东前线。那些年青人怨透了劳役，听说叫他们远离家乡去干苦差使，更加气愤。

杨玄感认为时机到了，他召集民夫陈述自己决定反抗隋炀帝的想法之后，民夫们马上起来响应。一下子杨玄感就拥有了 8000 士兵。他找来自己的朋友李密作自己的谋士，正式向隋炀帝宣战。从此之后，瓦岗军、河北起义军和江淮起义军一个个由弱到强地发展起来，隋炀帝不久也在江都被造反的军队杀掉了。

纵观隋炀帝的种种政治行为，可以说他既是隋朝的亡国之君，又是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他的残暴与荒淫行径最终搞垮了隋朝，连他自己也被人杀害了；但是他的开凿大运河的功绩却值得大书特书。早在唐朝就已经有人指出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是只顾人民的死活，用全国的财力开凿运河，结果造成国力衰弱，民怨沸腾，最后亡了国。但这条大运河却给后来的唐朝带来不可估量的好处。唐朝能成为一代盛世，大运河沟通南北的作用功不可没。

隋灭唐兴

从东汉末年董卓之乱起，到隋重新统一全国前，全国处于分裂状态达 400 年之久。

到了南北朝末期，由于阶级之间、民族之间的长期斗争，使社会行政与经济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士族门阀势力衰落了；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共同生产，互相合流了；许多落后的民族，进行了改革，如孝文帝改革，使经济和文化得到了发展。

南北朝时，建德六年，北周出兵灭齐，一举统一了长江以北各地，当周武帝伐齐时，陈朝大将吴明彻进兵夺取北齐的淮南。周灭北齐之后，立即伐陈，得淮南。从此，北周便据有长江以北和中上游，在北周末年，周武帝已经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形成了北强南弱的形势。

然而，曾准备“平突厥，定江南”的周武帝不久病死。这样，完成全国统一大业之任便落在隋文帝的身上。

隋的建立者杨坚，他的父亲杨忠，是北周的功臣，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封隋国公。杨坚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他的妻子是鲜卑大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的女儿，他的女儿又是周宣帝的皇后，因此杨坚在北周政权中有很高的地位。公元 580 年，周宣帝病死，继位的周静帝才八岁，杨坚以大丞相身份辅政，控制了北周的军政大权。相州（河南安阳）总管王谦先后起兵反对杨坚，被平定下去。杨坚在消灭了北周的残余势力后，于公元 581 年废周静帝自立，建国号为隋，改元开皇，仍建都长安。杨坚就是隋文帝。

隋王朝建立后，隋文帝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隋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日益壮大，远远超过了南方的陈朝，打破了南北的均势。

隋文帝开始了统一全国的行动。公元 587 年（开皇七年），隋灭掉建都江陵的后梁，扫除了向江南进军的障碍。公元 588 年，隋文帝又派杨广率领 31.8 万大军，向陈发动总攻击。隋军未遇重大抵抗，就攻下了陈都建康，俘虏了陈后主及其文武大臣，灭掉了陈国，重新统一了全国。

隋的统一，结束了自东晋以来十六国混战 270 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是有利于各民族的融合和经济文化发展的。

隋文帝死后，继位的是隋炀帝杨广。隋炀帝杨广不仅荒淫无耻，而且残忍毒辣，是历史上罕见的暴君。

为了向全国人民和向四邻国家显示淫威，隋炀帝经常外出巡游。他即位后的第一年八月，就坐船去游江都（江苏扬州），第二年四月才回到洛阳；第三年北巡榆林，至突厥启民可汗帐；第四年又到五原，出长城，巡行到塞外；公元 609 年西行到张掖，接见许多西域国家的使者。通计炀帝居住在洛阳的时间，不到一年。这无疑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耗费了国家的财富。

更严重的是无止境的徭役和兵役。隋炀帝好大喜功、奢侈无度。他不断地征发农民掘长堑，筑西苑，营建东都洛阳，开凿运河，修筑长城，缮治离宫，伐木造船，凿山通道等。

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隋炀帝任命宇文恺负责在洛阳建设东都。经过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第二年，东都就建成了。今天，东都的遗址在洛阳市区西边还可以看到。根据考古学家的考察，东都的外郭周围有 50 多里，城西北部是宫城，有巍峨的宫殿。外郭的南门，正对着著名的伊阙（古

关名，在伊阙山上)。市里还有丰都、大同、通远三市，是繁华的商业区，当时由西域远来的商人也到这里贸易。丰都市周围八里，店铺就有 3000 多家，可以想见当年东都的繁华。

隋炀帝兴建的每一项工程，大的要征役一二百万人，较小的也要征役一二十万人。隋炀帝还不断把极繁重的兵役以及和军事相关的徭役加在农民身上。后来，因为男子不够用，妇女也被逼服役。大规模的修建和远征，不管农忙或农闲，使农业生产被迫荒废。农民在服役中，遭受官吏残暴的折磨和过度的劳动，先后有上百万人被夺去了生命。

无休止的徭役、兵役和赋税给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把人民推到死亡的边缘。隋朝社会阶级矛盾迅速尖锐激化起来。走投无路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广大农民被迫揭竿而起，反抗隋朝的残暴统治。

大业七年(公元 611 年)，王薄首先在山东长白山(今章立、邹平、长山等县交界处)起义，活跃在齐郡(今济南)、济北郡(今茌平)一带。王薄自称“知世郎”，他作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起义。歌词中说：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
长稍(长矛)侵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这首歌词的大意是：长白山前的知世郎啊，穿着一身红衣英俊豪爽，长矛一举到天半，轮起大刀闪闪发光，上山吃獐肉鹿肉，下山吃牛羊。忽然看到官军打来了，提起刀就向他们冲去。到辽东去打高丽(朝鲜)也是死，反抗朝廷，即便被杀又何妨！

星星之火迅速发展成了燎原之势。王薄领导的长白山起义揭开了声势浩大的隋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同年，较有名的起义是孙安祖、窦建德在高鸡泊，张金称在邻县，高士达在修县，刘霸道在惠民等地发难。翟让与单雄信、涂州勋雄据瓦岗，王伯当及许多不知名者纷纷起义。公元 613 年，孟海公据济阳周桥，郭万豫在北海，郝孝德在平原相继起义。这时的礼部尚书，乘炀帝二征高丽之机，起兵反隋，杜伏威、辅公祜起义，江南、西北农民也起义反抗。

几年的斗争，逐渐形成了以窦建德为首的河北起义军，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杜伏威、辅公祜领导的江淮起义军等几支强大的农民起义队伍，他们割断了长安、洛阳、江都的联系，将隋统治集团包围了。其中瓦岗军力量最强大。

瓦岗军首领翟让，本来是东郡的一个小吏，由于得罪了上司，被打进牢监，还被判了死罪。有个狱吏同情他，跟他说：“我看你是条好汉，怎么能在牢里等死呢。”一天夜里，狱吏偷偷地砸了镣铐，打开牢门，把翟让放了。

翟让逃出了牢监，逃到东郡附近的瓦岗寨，招集了一些贫苦农民，组织了一支起义队伍。当地一些青年人，听到这个消息，都来投奔他。其中有一个青年叫徐世，年纪才 17 岁，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很有计谋。

徐世 劝翟让说：“这里附近都是贫苦的老乡，我们不应该去打扰他们；我看荥阳一带，来往的豪门富商很多，不如到那里去筹办点钱粮。”

翟让听从徐世 的意见，带领农民军到荥阳一带，专门打击官府富商，夺取大批资财。因此，附近农民来投奔翟让的越来越多，很快就发展到一万

多人。

一天，瓦岗寨门口突然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说要见翟让。卫兵把他带到翟让那里。原来他就是远近闻名的李密。李密出身于贵族家庭，父亲是隋朝有名的武将，被封为蒲山公。李密本来是杨素的儿子礼部尚书杨玄感手下的将官。杨玄感起兵反隋，被隋炀帝打败，李密也被捉去。在押送的路上，李密逃了出来。他在外面流浪了二三年，穷到吃草根、树皮的地步。隋朝官府到处追捕他，最后，他终于上了瓦岗寨。

李密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他又做过隋朝的官，政治斗争经验和指挥作战的本领比翟让这些人高明。他看到瓦岗军力量越来越大，可只是袭击来往官兵、抢劫运河上运货的船只，没有远大政治目标，便给起义军的将领们分析形势。他对翟让说：“如今杨广昏庸残暴，老百姓怨声载道，这和秦朝末年刘邦、项羽起兵时候的形势完全一样。凭您的才干，又有精锐的兵马，完全可以席卷洛阳和长安，推翻隋朝！”李密的分析，使农民军的首领大开眼界，他们对李密十分钦佩和信任。紧接着，李密又去说服瓦岗军周围的小股农民起义军和瓦岗军组成联军，共同作战。从此以后，瓦岗军越来越壮大，成为一股强大的反隋力量。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瓦岗军在翟让、李密的指挥下，打下金堤关（今河南省滑县南），拿下荥阳附近的几个县城，直逼荥阳城下。

荥阳地势险要，是通洛渠入黄河的枢纽，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瓦岗军围困荥阳，这种声势吓坏了荥阳太守（一个郡的最高长官）杨庆，他急忙向隋炀帝告急。隋炀帝任命张须陀为荥阳通守（一个郡的副长官），带领二万精兵，去援救杨庆。

张须陀是隋朝有名的猛将，十分阴险狡猾，王薄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就是被他镇压下去的。过去，他曾几次打败过翟让，因此，翟让听说张须陀带兵来救荥阳，很紧张。

李密却沉着冷静，客观地分析了情况后，决定智取张须陀。翟让按照计划行动，最后四面包围了张须陀，把隋军杀得尸横遍野，溃不成军。张须陀也被起义军杀死。

第二年春天，李密又提议攻打东都洛阳附近的兴洛仓（在今河南巩县）。

兴洛仓也叫做洛口仓，是隋王朝建造的最大粮仓。仓城周围20多里，城里挖了三千个大窖，每个窖里贮藏着八千石粮食。这都是隋王朝多年来从各地农民身上搜刮来的血汗。

李密率领七千精兵，攻下了隋朝的兴洛仓，并打开仓库，把粮食分给老百姓。人们奔走相告，感谢瓦岗军，纷纷送自己的子弟参加起义军。瓦岗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到几十万人。

翟让看到李密很有政治眼光，又屡建战功，就把瓦岗军的领导权让给他。这样，李密称魏公、行军元帅，改年号为永平。李密封翟让为司徒（相当于丞相）。洛口仓扩建为洛口城，成为农民政权所在地。瓦岗军发布了讨伐隋炀帝的檄文（檄文，声讨敌人的文书），列举了隋炀帝10大罪状，指出：“罄（用尽）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意思是说，隋炀帝的罪恶，把南山上的竹子都做成竹筒，也书写不完；决开东海，用海水也洗刷不清，号召人民起来共同推翻隋王朝。

瓦岗军建立政权以后，南北起义军纷纷响应，前来归附。李密因而成了中原起义军的领袖。

但此后，瓦岗军内部发生了分裂。公元 617 年，李密摆下“鸿门宴”，杀掉了翟让。不久，徐世、王伯当等回到浚县，驻守大狂山，瓦岗军势力渐衰。

公元 618 年 6 月，宇文化及北上，和窦建德、李密争夺中原。王世充也从洛阳进逼瓦岗军，李密腹背受敌，迫于形势，降了王世充的主人杨侗，为讨好杨侗，大胜宇文化及于童山下，准备至洛阳领赏。可王世充发动兵变，又领两万人攻打李密。李密因为久战疲惫，内部矛盾也很大，败阵了。这时的李密只好改投势力壮大的李渊了。后来李密被李渊杀害了。

河北的窦建德也是一支同隋军作战的起义军，他的队伍也发展很快。

公元 616 年 12 月，隋大将杨义臣亲自攻打张金称的起义军。同时，邹绪率精锐隋军攻击窦建德、高士达。窦建德诈降邹绪，诱其至长河地界，斩之，大获全胜。

杨义臣击败张金称后，又乘胜进攻高鸡泊，窦建德认为宜避开隋军，寻机与战，可高士达不听，迎战隋军，取得了一次胜利。可是他骄傲自满，放松了警惕，结果，败阵牺牲。隋军撤去，窦建德抓紧有利时机，收编张金称和高士达的残部，进行整顿发展至 10 余万人，声势浩大。

这年，大业十三年六月以后，炀帝一面派王世亮去东都伐瓦岗军，一面派薛世雄率二万精兵镇压河北农民军。窦建德放出风声，说是自己也撤去，实则半路布下精兵近万人，这解除了薛世雄的戒备心理。窦建德身先士卒，乘大雾之机向薛世雄发动猛攻，歼敌万人，俘获万余。这次战役结束以后，窦建德已占领了河北大部。公元 618 年，窦建德改国号为夏，改元五凤。

公元 620 年，李世民进攻王世充。王世充求援于窦建德。窦建德率 10 万军队增援，结果在荥阳以北地区中了唐军埋伏，溃败，窦建德也被俘。唐朝消灭了这支起义力量。

窦建德起义后第二年，杜伏威、辅公祜在长白山举起义旗。杜伏威当时年仅 16 岁，但作战中“出则居前、入则殿后”，成了领袖人物，公元 613 年，加入了长白山左君行的队伍，由于意见不合，便转战到淮南，用软硬两手，迫使苗海潮的起义军并入了自己的队伍，壮大自己的力量。另外，海陵赵破阵领导的起义军也被并入了他的队伍。这样，这支队伍的力量也更加可观了。

地主阶级是不会坐视起义军的日益壮大的。隋校尉宋颢前去镇压。起义军佯败后退，诱敌深入至葭芦中，用火攻，使隋军殒灭。这次胜利，大大提高了杜伏威的声望。

公元 617 年初，隋炀帝又派右御卫将军陈棱带精锐部队进攻杜伏威。杜伏威起义军奋勇杀敌，隋军全线溃乱，陈棱仅以身免。杜伏威乘胜攻破高邮（江苏高邮），占历阳（安徽和县），据丹阳（江苏南京），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杜伏威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就成了江淮一带力量最大的革命队伍了。

在江淮一带，与杜伏威领导的起义军密切相关的还有李子通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沈德兴领导的地主武装割据势力。

李子通，家庭贫困。加入了左才相的长白山队伍，不出半年，已聚众万余人。左才相妒其才，迫使其离开长白山，到了淮南，加入了杜伏威起义军，不久以后，李子通妄图谋杀杜伏威，杜伏威受袭时，身受重伤，被王雄诞所救，隋军乘农民军内部矛盾的爆发，首先进攻杜伏威，又攻李子通。二者俱被打败，李子通奔向海陵称将军，整顿队伍。

公元 618 年，江都政变，宇文化及封陈棱为江都太守，成为隋政府江、淮一带的主要力量。公元 619 年，李子通攻江都，陈棱向杜伏威和沈德兴同时求援。李子通在两支援军间制造矛盾，使其互相猜疑，不敢前进。李子通乘机猛攻江都，取胜，陈棱只好投靠杜伏威了。公元 620 年，李子通又进攻沈德兴，取京口，破吴群。沈德兴被迫跳江自尽了。

李渊建立唐朝后，杜伏威于公元 619 年投降了唐朝，正式成了唐朝的地方官。杜伏威又派王雄诞进攻李子通，将其送到长安，后被杀。

杜伏威的起义军内部，三位主要将领之间也矛盾重重，杜伏威赴长安后，长期无言语。辅公祜利用王雄诞的病期，于公元 623 年，夺其兵权，发动了反唐的起义。消息传到长安，高祖立即派军镇压。李孝恭、李靖等率领强大水陆军围剿，辅公祜被击溃，后在丹阳被杀害了。这支声势浩大的起义最终也被唐统治者平定了。

农民大起义推翻了隋朝的统治，但是，胜利的果实却落到了大官僚李渊的手中。

李渊的祖父李虎是西魏和北周最高军官八柱国之一，死后追封唐国公。李渊七岁便继承了唐国公的爵位。大业十二年（公元 616 年），隋炀帝任命李渊做太原留守。尽管李渊镇压农民起义很卖力气，可是隋炀帝还是不信任他，另派自己的心腹王威、高君雅做太原副留守，监视他。所以，李渊敢怒不敢言，整天饮酒度日。

李渊有四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玄霸，李元吉。其中李世民最有政治眼光，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隋朝的统治不会长久，只有乘天下大乱的机会，夺取政权，才能保住家族的地位和利益。

晋阳（今山西太原）县令刘文静，十分看重李世民。李世民也把他看作知心朋友。刘文静跟李密是亲家。李密参加起义军后，刘文静因受牵连而被革了职，被关押在晋阳的监狱里。

李世民听到刘文静坐了牢，十分着急，赶到牢里去探望。李世民拉着刘文静的手说：“刘大哥，我来探望，不但是为了叙叙友情，主要是想请你帮我出个主意。”刘文静早就知道李世民的心思。他说：“现在皇上远在江都，李密逼近东都洛阳，到处都有人造反。这倒是打天下的好时机。我可以帮你收集 10 万人马，你父亲手下也有好几万人。如果用这支力量起兵，打进长安，号令天下，不出半年，就可以取得天下。”李世民高兴地说：“你真说到我心里去了。”

经过李世民的劝说，再加上当时农民起义形势很好，眼看隋朝的统治行将崩溃，太原留守李渊决定乘机起兵争夺天下。

炀帝进攻高丽时，李渊就有取隋而代之的打算。李渊任太原留守之时，因为对突厥作战失败，炀帝要对其问罪，这便成了李渊起兵的导火索了。

当获知炀帝要赦免时，李渊便指使刘文静假造诏令，打着皇帝的旗号，说要“伐辽东”，以鼓动人心，集结队伍，恰此时，马邑人刘武周兵变，杀太守王仁恭，又引突厥直逼太原，李渊又以讨伐刘武周为辞，提出自行招兵买马。这时，负有监督使命的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迫于形势只好同意。李渊组织了晋阳起兵的主力军。

当李渊、李世民父子加快了军事部署时，王威和高君雅怀疑李渊有异志，便蓄意杀害李渊。可此事被告密败露，李渊等决定将计就计，于晋阳宫杀掉二人。晋阳宫事变，标志着李渊父子公开起兵了。

公元 617 年（大业十三年），李渊自称大将军，派李建成和李世民分别做左右领军大都督，刘文静做司马，又把兵士都称为“义士”，发难后，李渊集团的目的是入关取长安，号令天下，建立新王朝。

就在这时，瓦岗军已经包围了东都洛阳，关东一带的隋军主力已被农民起义军击溃，起义军又攻占了长安外围的许多据点。李渊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率领大军向长安进发。隋朝大将宋老生率军驻守霍邑，阻止李渊西进。这时候，大雨下个不停，军粮也不多了，李渊就想退兵。李世民劝阻说：“我们本来是兴义军拯救百姓，现在一遇挫折就后退，军心不是要散了吗？我以为决不能退兵。”他身先士卒，率领军队攻打霍邑，果然取胜，宋老生被杀死。此后一路顺利，渡过了黄河，在秋天攻进了长安城。李渊为了收拢人心，下令开仓济贫，废除了隋朝一些苛刑峻法，深得百姓拥护。短短几个月，军队就发展到 20 万人。

霍邑之战，李渊父子主要是靠发挥骑兵的优势打败宋老生的。这是李渊父子骑兵对隋朝步兵的重大胜利。

平霍邑后，李渊父子便围困关中之门户河东，隋将屈突通自守，李渊攻而不下。这次战争，李渊表露了自己的军事天才，分兵两路，大军渡河入关，重点攻取长安，同时留相当兵力对付屈突通，如不先平屈突通，贸然入关，前有守军，后有屈突通之援，势必败于腹背受敌；如全力攻打屈突通，长安则不能唾手可得。

李渊建立新王朝是很顺利的，晋阳起兵实为反隋，可是他是打着“尊隋”的旗号进行的。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拉拢了隋朝的各种官僚势力，减少了障碍，所以能速取关中，站稳阵脚，最后建立新王朝。

公元 618 年（大业十四年）3 月，隋朝右屯卫将军宇文文化及，发动兵变，杀死了隋炀帝。消息传来，李渊即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唐，李渊就是唐高祖。

此时，李渊虽为帝，但仅据关中，下一步，他便要统一全国，要做全国的皇帝。

唐初统一战争的第一个大战役是李世民挂帅亲征的对薛举、薛仁杲的战争。这实质上也是争夺关中的斗争。李渊占长安后，薛举父子便以 10 万之兵进逼渭水之滨，包围了扶风郡城，构成了对李渊的严重威胁。这时，世民挺身而出，率众大破薛仁杲于扶风，并追至陇坻而归，攻取了巴、蜀之地。

但是薛举不甘失败，勾结突厥，在李渊称帝后入侵至幽州一带。秦王李世民与刘文静、殷开山率八总管兵前往抗击。由于世民患病，便将指挥之权交与刘、殷二人，可是，刘、殷二人自恃势大，陈兵于高墟，被薛举以轻骑偷袭背后，唐军大败。李世民和残兵退回长安，这战，使他日后历次战争中都保持清醒的头脑。

薛举获胜后，大军又直趋长安，出发前，薛举病死，薛仁杲即位。这时，李世民再次讨伐。临近高墟，便“坚壁不动”，相持 60 余日，敌军粮尽，军心动摇。李世民一看时机已到，便派军于浅水原，引诱敌军。敌将宗罗候全力攻击。唐军顽强抵抗。乘敌军疲乏之际，将领庞玉到浅水原南部布阵，与宗罗候酣战。李世民亲率大军由浅水原北出击。又率数十骁骑冲进敌军，打败敌军。紧接着，李世民率二千骑兵追至折墟城下。薛仁杲引兵入城拒守，是夜，唐军各队纷纷赶到，包围了敌城，薛仁杲次日晨投降。大胜后的李世民凯旋回长安，斩薛仁杲于市。

唐建立后的第二个大战役，是李世民指挥的平定刘武周的战役。刘武周

当时也想夺取关中，他联合突厥，又接受了大将宋金刚的建议，准备南下同李渊决一雌雄。

宋金刚于武德二年陷太原，随即占领太原。太原是李渊父子起兵之地，是其重要的后方基地，消息传到长安，关中大震，形势十分险恶。李渊准备放弃河东之地，坚守关西，并派李世民前往讨伐刘武周。

世民率军扎营于柏壁。与宋金刚对垒相持。军事上依旧“坚壁不动”。十二月，唐将殷开山、秦叔宝在美良川大破刘武周之将尉迟敬德、寻相。经过长达五个月的对垒相持，敌军气势日衰，运粮道也被唐军切断。唐军出击，几次大败宋金刚，招降一位杰出的精骑将领尉迟敬德，刘武周得知全军溃败，便带百余骑士奔突厥。世民进驻晋阳，收复旧地。

规模最大的一次统一战争，就是李渊父子出关东下对王世充和窦建德的战争，历时一年零四个月。

隋炀帝死后，东都洛阳还在隋朝的东都留守杨侗（炀帝的孙子）和大臣王世充手里。王世充把杨侗立为皇帝，继续打着隋朝的旗号，对抗起义军。

东都周围本来是瓦岗起义军活动的地区，李密曾经多次打败隋军，可是，因为李密骄傲自满，跟将领们互相猜忌，在跟北上的宇文文化及人马打了一仗之后，力量渐渐削弱。王世充看准李密的弱点，发起一次袭击，打垮了李密大军。李密带着残兵败将，逃到长安投靠唐朝。

王世充赶跑了李密，自己认为力量强大，把杨侗废了，自立为帝，国号叫郑。

这时候，唐军已经削平了西北的几个豪强割据势力，稳定了后方。公元620年，唐高祖派李世民统率大军进攻东都。李世民大军一出关，河南许多州县纷纷投降，很快就把东都包围起来。

李世民不但善于用兵作战，通晓兵法，而且野心很大，他大力收罗人才。他从原瓦岗军和别的割据势力的降将中，收留了一批文武人才。像有名的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等都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曾经有一次，李世民亲自带了500骑兵在阵地上巡视，被王世充发现，发动一万多步兵骑兵突然围上来，王世充的大将单雄信冲到李世民身边，用长矛直刺过来。李世民后面的尉迟敬德飞马赶上，大喝一声，把单雄信刺下马来。尉迟敬德保护李世民突出包围，两个人又带着骑兵转过身在郑军阵地来回冲杀，吓得郑兵不敢阻挡。接着，后面的唐军源源不绝地上来，把郑军打得一败涂地。

世民再次挂帅，大军直趋河南，发动攻坚战。以五万骑兵夺取了东部西线的主要据点慈涧。王世充的守兵退回洛阳。紧接着，李世民做了重要的部署，派史万宝据“龙门”；刘德威自太行东围河内；王君廓切断东都粮道；萱君汉自河阴攻回洛城。与此同时，李世民亲率主力大军屯于洛阳以北的北邙山，连营以逼之。就这样，筑成了对东都的包围圈，断其供应，陷其于孤立挨打的地位。

8月，王世充陈兵于洛阳西北的青城宫，世民也旗鼓相当地开阵。王世充隔水传话，约以割城。其实他不明白李世民要统一天下的决心，以为只要割地，世民便会容他再行割据独霸一方，李世民严辞拒绝，“奉诏取东都，不令讲好也。”9月，“河南郡县相继来降。”但此时王世充还是有相当的战斗力的。

至唐武德四年二月，王世充之子率数千兵，自虎牢运粮入洛阳，遭到唐

军毁灭性的打击。困于供养，王世充只好自守，不敢复出。但守御极严，唐军无法攻克。将士都疲惫思归，但是世民认为大举而来归城，当一劳永逸，不能半途而废。何况洛阳孤城，势不能持久。坚持继续围攻。至此，已相持八月有余，未见分晓。

正当双方争持未决，洛阳将下而未下之际，在唐军的背后突然出现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原来，困境中的王世充曾多次求援于河北起义军首领窦建德。人多势众的窦建德先是坐观虎斗，后来，唐强王弱已成定局，他便决定援助王世充。

窦建德领导的起义军是河北一支强大的力量，王世充自称郑帝以后，窦建德也自称皇帝，国号叫夏，攻占了唐军许多土地。他接到王世充的求救信，一面带领 30 万人马，水陆并进，援救东都；一面派出使者给李世民送去一封信，要李世民退回关中。

面对这种新形势，李世民的部下出现了意见分歧。李世民比较两种主张，权衡利弊。决定令屈突通协助元吉围困东都，亲率精骑 3500 余众，急奔虎牢关，阻挡窦建德的西进。

于是，就在这个时候，著名的虎牢之战发生了。窦建德无法挺进，筑军于板渚。窦建德数战不利，军心有所涣散。可窦建德一心只想决战。李世民渡河，牧马于河北，留下千余匹，伪装粮草已尽，以惑窦建德，而本人则当晚返回虎牢。次日晨，窦建德果以全军出击，世民按甲不战。及至中午，窦建德军饥倦，争着喝水，席地而坐，全无斗志。世民抓住战机，下令攻击。窦建德军队迅速被击溃，窦建德也被俘。之后，王世充惊惶而降，唐初统一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到这时候，天下大部分地区都已归于唐的统治之下。最后一次统一战争是对刘黑闳的战争。窦建德失败后，唐王朝并未能有效地控制河北地区。由于唐朝官吏实行严厉惩处起义军的办法，激起了窦建德部将刘黑闳的起兵。

武德四年十二月，李世民和李元吉讨伐刘黑闳，次年 2 月，唐将秦叔宝破刘黑闳军队，接着李世民又以坚壁不战大败刘黑闳。后刘黑闳迅猛异常地二次卷土重来。皇太子李建成亲征。根据魏征的建议，争取人心，安定社会，刘黑闳的部众溃散了。武德六年，刘黑闳被杀。

这四次大战役，主要是李世民指挥的，取得了显赫的战功。另外还有李孝恭指挥的平定以杜伏威、辅公祐为首的江淮义军，平定萧铣的梁政权。经过一系列战争，唐王朝最后统一了中国。

历史的车轮驰至今天，客观地向人们提供治国富强的经验与一些惨痛的教训。因此，总结历史，可以鉴今，确保现实的正确发展方向。

历史又是何其的相似。历史之剧有重蹈的时候，可是人们往往会忘记一次错误，以致悲剧重蹈其辙。

秦二世灭亡，隋二世也灭亡。

秦王朝是在远征近战、灭六国的基础上建立的，结束了中国的割据状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封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隋呢？也是在三国、二晋、南北朝长期混战、对峙的局势中崛起而一统天下的朝代，秦、隋同样地完成了同样的任务。

秦亡于苛政，秦之残暴统治与四处征战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忍亦死，反亦死，一人呼之，天下响应，揭竿斩木，兵变四起，奋而亡秦，汉续之；隋一统天下，大兴石木，建洛阳，征高丽，战突厥，劳民伤财，以致炀

帝被杀于江都，承亡国之罪名，隋不鉴史，终蹈秦之辙。

隋朝自文帝开国，到炀帝身亡，历时只有短短的 37 年。隋王朝在隋末农民起义暴风骤雨式的打击下二世而亡，隋亡唐兴，为唐初政治家提供了活生生的教材。

唐初统治者清楚地看到一个富强的隋朝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因此唐初的几个帝王的统治指导思想都对农民采取了让步的政策。

唐统一全国后，政治上仍保持清廉的作风，唐太宗善于用人，肯于纳谏，重用一些有才能的人为官，辅佐政治。

在经济上，采取了许多对农民有利的措施。轻徭薄赋，不夺农时。这样，生产状况迅速好转。

唐太宗又败突厥，退吐谷浑，连吐蕃。唐太宗的羁縻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经过君臣的努力，唐朝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况，和外国交流也日益频繁，长安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唐所采取的文化和经济措施对许多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乱平定后的唐朝迅速发展，蒸蒸日上，成为一个空前强大的东方大帝国。

手足相残，血溅禁门——玄武门之变

李渊建唐伊始，其长子建成和次子世民之间即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储位之争。在这场激烈的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搏斗中，李世民技高一筹，先发制人，制对手于死地。公元626年6月4日，他经过周密策划，发动宫廷政变，诛杀其兄李建成、其弟李元吉于长安玄武门，迫使其父李渊退位，自己登上皇帝宝座。这次兄弟相残、喋血宫门的事件，史称“玄武门之变”。这场宫廷政变之所以酿成，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的。

隋朝末年，炀帝暴虐，民不聊生。贫苦百姓，走投无路纷纷揭竿而起，起义烽火遍布全国。在隋朝灭亡已成定势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许多贵族大臣为了保全自身利益，趁火打劫，纷纷拥兵割据，遍地称王，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准备夺取最高统治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李渊集团。

太原留守李渊（566—635年），先人是隋重臣，世袭唐国公。尽管李渊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很为朝廷卖力，但是炀帝却始终不信任他，派自己的心腹王威、高君雅做太原副留守，监视他的举止。李渊敢怒不敢言，整日酒色度日，但暗中却蠢蠢欲动。

李渊膝前四子：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玄霸、四子元吉。除玄霸早逝外，其它三子个个英武，雄心勃勃。在诸子中，次子世民雄才大略，英姿绝伦，智勇无双。他见隋朝大势已去，便暗结天下英雄豪杰，蓄意经略天下。他对李唐的奠基、创建及强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只有趁天下大乱之机，夺取政权，才能保住家族的地位和利益。他一面广结天下豪杰，积蓄力量，一面积极鼓动父亲李渊起兵反隋。李渊虽然也有起兵的想法，但一直顾虑重重，不敢贸然行事。

晋阳县令刘文静是个很有头脑的人。当时因为与农民起义军首领李密是儿女亲家，被炀帝免职关入监狱。他虽然比李世民年长许多，但非常钦佩李世民的才华和胆略，与他成了好朋友。李世民由于想不出合适的办法鼓动父亲起兵，于是就求助于刘文静。李世民感慨地说：“像您这样正直的人也被关进监狱，这世道真是忠奸不分啊！”刘文静想，今天李世民到监狱来看我，肯定有原因，于是就试探地说：“如今天下大乱，哪还有什么忠奸可言！除非有汉高祖、光武帝那样的英雄人物，才能收拾局面安定天下呀！”李世民说：“怎么知道现在没有那样的人物？只怕是一般人不知道而已。今天我来这里，就是想和您商讨天下大事，听听您的高见。”

刘文静听出李世民以刘邦自居，有推翻隋朝建立新王朝的雄心，非常高兴，于是就对李世民谈了自己对天下大势的看法。

“我到底没有看错公子。如今天下大乱，烽烟不断。李密率领的瓦岗军，已打到东都洛阳城下，洛阳守军连吃败仗，无力招架。反隋烽火燃遍全国；造反势力，此起彼伏，隋朝江山眼看已无法收拾。皇上只顾在江南游玩，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如果有一个英杰，把各种反隋力量联合起来，夺取天下，易如反掌。太原百姓，为避战乱，纷纷入城。其中不乏英雄豪杰。如果把这些人收编起来，可得十万之众。令尊唐国公，坐镇一方，拥兵数万，德高望众，倘若振臂一呼，谁敢不应？趁长安空虚，洛阳之军又被李密瓦岗军牵制无力救援之机，率军入关，攻占长安，号令天下。我敢说，不出半年就可以建立帝王伟业，隋朝江山就非李家莫属了。”

率军入关，占领长安，夺取天下，正是李世民朝夕盘算的大事。因而刘文静说完，他马上点头表示赞同，说：

“我与您的想法完全一样。现在正是大丈夫展示身手的大好时机，您我都要高瞻远瞩，有所做为。”说到这里，他皱了一下眉头说：“只是如果父亲不同意起兵，那该如何是好？”

刘文静想了一下，对李世民耳语几句，李世民马上点头微笑。

第二天，李世民就派自己的亲信、擅长赌博的高斌廉带着巨款找晋阳宫监裴寂赌博。裴寂是刘文静的好友，将近50岁，是个怀才不遇，不满现实的人。又是李渊的好友，李渊很可能听从他的意思。裴寂非常喜欢赌博，李世民就投其所好，以便结交他，好请他劝说父亲。一会儿，他就把高斌廉带去的钱全赢了。裴寂兴高采烈，留高斌廉吃饭。吃饭时，高斌廉说：“您知道您赢的钱是谁的吗？”裴寂吃了一惊，忙问究竟。此后，李世民与裴寂的交往就越来越多，两人的关系日益密切。

一天，两人正谈得高兴，李世民忽然沉默不语，一脸忧愁的样子，裴寂忙问：“公子有什么为难事吗？”这时李世民才把自己心事告诉裴寂。他说：“皇上把我们家看作眼中钉，时刻想找借口除掉李家。我家真是朝夕不保啊！就目前局势来看，早晚将有大变动。我想乘机大干一番，只怕父亲不同意，您看怎么办？”

裴寂经常听刘文静称赞李世民“非平庸之辈，是汉高祖、光武帝之流的人物，年纪虽轻，却是匡扶救国的奇才。”心想，这样的人物现在如此信任他，找他帮忙，将来打下天下，自己就是开国元勋。因此，他郑重地说：“公子不必着急，我自有办法。”

裴寂想起前不久李渊曾收下他送去的两名晋阳宫宫女，便决定在这件事上做文章。一天，他与李渊一起喝酒，酒至半醉时，裴寂忽然说：“大人，都是我害了您，我送的两名宫女的事，恐怕要传出去了……”。李渊大吃一惊，吓出一身冷汗，酒也醒了许多。私留宫女，乃是灭门之罪，万一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裴寂接着说：“二公子世民怕事情败露，正在招兵买马，网罗贤能，我看我们应该先下手为强。谨小慎微，危在旦夕，起兵举事，或可成功。”李渊沉吟半晌，也无可奈何，只说：“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

此后，李渊一想起宫女的事就愁眉不展。此时又值突厥来犯，李渊派太原副留守高君雅率兵迎战，却连吃败仗。守卫北部边防，防备突厥来犯是李渊的职责，现在连吃败仗，万一朝廷问罪下来如何应付？炀帝非常残暴，杀朝廷重臣如同宰鸡一般，李渊如何能不害怕？想到这些，李渊更是焦躁。

李世民觉得这正是劝说父亲起兵的好时机。一天，趁四周无人时，悄悄对李渊说：“当今皇上昏庸无道，大兴土木，开凿运河，四出巡游，远征高丽，百姓穷困潦倒，天下到处都是烽火，晋阳（今山西太原）城外就是战场。您若一味拘守小节，唯思尽臣子本分，那么，下有流寇走盗进逼，上有严酷刑法，不是死于流寇之手，就是死于皇帝刀下，危在旦夕。如今反对暴政苛税是大势所趋。我看不如顺乎民心，率兵起义，才能化险为夷，化祸为福。天赐良机，不能坐失啊！父亲，您还要等到何时？”

李渊听到这话，把脸一沉，训斥说：“放肆！你怎敢说这种剿灭九族的话？我马上把你治罪！”

李世民沉着地说：“我是看天时、人事都是如此才敢对您这样说的。如果您真要把我治罪，随您的便，我虽死无憾。”

这时，李渊才换了一副面孔，小声对世民说：“我哪忍心治你的罪。只是怕你做事不机密，坏了大事，招致大祸，因此警告你千万不要随便乱说。一定要小心谨慎，此事关系重大，切不可走漏风声！”

原来，李渊也已清楚大隋朝已摇摇欲坠，朝夕不保了。李渊早有野心，他正在观察形势，寻找时机。李渊是个饱经世故，老谋深算的人。他既想当皇帝，又不愿冒太大风险。尽管暗中已在做准备，但还没最后下决心。因此他不露声色，不到他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他是决不会轻易冒险的。

李世民摸清了父亲的心底，决定趁热打铁劝父亲加快行动。第二天，他又对李渊说：“现在盗贼遍于天下。皇上命令您讨灭盗贼，您能把他们杀完吗？平不了盗贼，皇上会怪罪您的；平了盗贼，皇上本来一直不信任您，也会因此更加猜忌您。总之，无论如何都是死路一条。只有听我的话，才是万全之策。当机立断吧！”

其实，李世民昨天的话，已深深的打动了李渊。他想了一夜，越想越觉得世民说的有理，只是还有些犹豫，他叹口气说：“昨晚我想了一夜，感到你说的也有道理，我现在方寸已乱，不能做主。今日或家破人亡，或得天下都由你定。如果我们起兵成功，就立你为皇太子。”李世民赶忙叩谢。

正在这时，炀帝因李渊御敌败绩，大为恼怒，派遣使节来太原问罪，准备逮捕李渊。李渊赶紧召裴寂、世民商议。他们对李渊说：“本来是高君雅打了败仗，但由于他是皇上派来监视您的，皇上信任他，所以不处罚他，只拿你问罪，是何道理！目前事在燃眉，赶快决断吧！”

李世民接着慷慨陈词：“太原人才济济，兵强马壮。晋阳宫里，粮草、兵器、储存很多。凭这些条件，完全可以大功告成。皇上远在江都，留守京都的代王只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根本无力镇服四方。当今主昏世乱，关中豪杰四起，择主而事。现在所缺的就是一位有威望的大人物。如果大人您举兵西行，安抚各路人马，众豪杰必然闻风归附，攻取长安，如探囊取物。为什么要坐视待毙，听任一个使者摆布，坐等灭族呢？”

在李世民的一再鼓动下，李渊终于下定决心，彻底与隋政权决裂，杀掉了隋炀帝派来监视他的王威和高君雅。于公元617年5月，正式起兵反隋。

当时，李建成、李元吉正在河东，接到父亲急信，急忙率兵奔赴晋阳城，同年6月，李渊父子会师晋阳，实力大增。

若论“首义”之功，建成、元吉未直接参与，自然不能与李世民相比。因此，自起兵时起，世民所起的作用就比建成、元吉的作用要大，日后不免为他们妒忌。

同年7月，李渊命李元吉留守太原，处理一切军政事务，自己偕建成、世民率领大军，进军关中。由于炀帝昏庸无道，暴虐荒淫，早已丧尽民心。李渊又打着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旗号，一路上人心所向，大军所向披靡，很快取霍邑，克临汾，渡黄河，于当年11月占领长安。立炀帝幼子为帝，自封唐王，担任大丞相。尊隋炀帝为太上皇。这样，他既取消了炀帝的帝位，又可以利用杨侗（隋恭帝）这块招牌招降隋朝的文武官员，把全部大权操纵在自己手里。

公元618年3月，隋炀帝在江都被亲信宇文化等杀死，隋王朝彻底瓦解。5月，李渊在长安称帝，改国号唐，他就是唐高祖。封长子建成为太子，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

这时天下尚未统一，唐高祖和太子建成留守长安，派世民率军征讨天下，

先后打败了薛举父子、李轨、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闥、杜伏威等诸路兵马。终于在公元624年，完全消灭了各地的农民军和地方割据的地主武装，统一了中国。这时李世民年方24岁。

李渊能够建唐称帝，李世民可以说是首功。由于连年率兵征战，他的功劳和声威，日渐升高，军功大大超过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这就为日后争夺皇位，兄弟相残留下了祸种。

太原起兵，主要是李世民一手策划的。在建立唐王朝和削平群雄，统一中国的战争中，李世民出力最多、功劳最大。可以说没有李世民就没有唐王朝。李渊既有言在先，论才华、功业、名望，太子之位更非世民莫属。早在李渊自封唐王时，将领和谋士们就曾要求封世民为唐国世子，李渊也有这个打算，但李世民见时机尚不成熟，不愿过早掌权，以免树敌太多。于是就坚辞不受。但建成、元吉对此猜测不已，认为世民另有所图。

李渊称帝后，许多人拥护世民为太子，世民也逐渐产生觊觎皇位的政治野心。此时，如李渊能恪守前言，立李世民为太子，顺天意而服人心，则储位之争，萧墙之祸或可避免。可惜李渊在建唐之后，即陷于立贤与立长的矛盾之中，最后屈服于封建的“立嫡以长”的惯例，自食其言，改立李建成为太子，这样，继位之争，兄弟相残终成不免。李渊自己又无主见。他看到建成才识平庸，不孚众望，世民才识超群，智勇双全，又功高盖世，四海归心，常萌易储之心，但又游移不定，这就更加剧了储位之争。

李建成虽为太子，但李世民却不但掌握着大量军队，而且还身兼丞相，地位十分显赫，这自然对太子建成构成了威胁。建成心里不安，便决定联合元吉共同对付世民。

李元吉勇猛过人，在战场上也立过不少战功。但是他骄逸放纵，名声很差，当他目睹两位兄长之争时，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元吉本人也觊觎皇位，如果跟随世民，显然不能实现自己的野心，而投靠建成则或许有利，因为建成承诺他登基后，将封元吉为皇太弟。而且元吉认为，只要除掉世民，他入主东宫就轻而易举，于是，他便与李建成联合，共同对付李世民。

在这场继位之争中，李世民除德、才、功、望远超过李建成外，还享有人才优势。这也是他日后成功的关键。

自太原起兵后，李建成和李世民都统率大军，身任元帅，他们各自收罗人才，广树羽翼。

在进军关中、平定陇地、统一中原的战争中，李世民放手罗致人才。在历次战争中，他先后罗致了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刘师立等杰出将领。同时他又广泛结交地主阶级中的知名人士，借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

公元621年，李世民被封为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之上；天策府内可以置官属，设精兵八百，四方归顺之士日益增多。

同年，李世民以“海内渐平”，开设文学馆，招纳八方文人贤士，著名的有长孙无忌和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学士。

由于他一贯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天下豪杰望风而归。秦王府一时成了人才荟萃之地。李世民很快便组成了以房玄龄、杜如晦等为首的智囊班子，从而形成了以李世民为中心的文武俱备的政治集团。

李建成在太原起兵后，也统领军队，打过一些胜仗，虽没有李世民实力雄厚，但他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因此也有一大批皇亲国戚聚集在他的周围；他长期留守关中，在京城长安一带有坚固的基础，甚至宫廷的守军（玄

武门的卫队），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他手下也罗致了许多人才，文的如魏征、王桂等日后的贞观名臣，武的也有冯立、薛万彻等猛将，此外还招募长安骁勇 2000 余人作东宫卫士，称长林军。此外，他还把齐王李元吉拉拢过去。齐王虽然力量最弱，但本人以勇猛著称，也有相当势力。因此，总的来说，李建成与李世民势力不相上下。

李建成见李世民对他的威胁很大，于是便千方百计的削弱秦王的势力。他一方面拉拢和打击李世民的文武人才，以图架空李世民。

尉迟敬德勇猛过人，是李建成最惧怕的人物，也是李世民的得力干将，因而他也成了李建成重点和首要的拉拢目标和打击对象。一次，李建成暗中给敬德送去一车金银宝物，并写信表示“愿结为布衣之交”。但被尉迟敬德断然辞绝。他说：“敬德出身寒微，遭逢乱世，久陷困境，秦王知遇之恩，尚未报答，对殿下并未效力，如何敢接受您的重赏。若私交殿下，便是对秦王暗怀二心，因贪图享乐而忘忠义于脑后，这种不忠不义的小人，对您又有何用？”建成碰了一个软钉子，只好收回礼物。敬德即将此事转告世民，世民说：“你心如山岳，虽积金至斗（指北斗）也不会背叛我，他送礼物，你就收下，以便对付，现在你这样做，他们将会加害于你，你要提防。”果然，建成收买不成，恼羞成怒，随即派力士在夜间去刺杀敬德。敬德把大门打开，安卧不动，刺客见状大惊，在门外转来转去，始终未敢入内。

李建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李渊面前诬告尉迟敬德谋反。李渊派人把尉迟敬德投入监狱，打算处死。幸亏李世民竭力营救，才留下一条性命。

李元吉又以金银绸缎想收买秦王府右二护军段志玄，也遭到拒绝。

接着李建成又想把程咬金调离秦王府。程咬金是秦王府的又一猛将，如果把他和敬德都调离秦王府，李世民的护卫力量就被大大削弱了。程咬金洞察了李建成的阴谋，他对李世民说：“如果您的左右臂都被砍掉，您的身躯还能活多久呢？我愿冒死留京，请您早下决心。”但李世民一直犹豫不决。不久，建成、元吉又在李渊面前诬陷，把房玄龄、杜如晦逐出秦王府。由于建成、元吉的步步紧逼，秦王府上下人人自危。

一次，建成邀请世民到东宫喝酒，暗在酒中下了毒药。李世民毫无戒备之心，一饮而进。突然感到心痛如绞，吐血不至，幸亏淮安王及时把他送回秦王府，加紧抢救，才算保住性命。

又有一次，李渊与三个儿子一起出城打猎。建成有一烈马，十分肥壮，骠悍无比，常在飞奔途中突然仆倒，把人摔死摔伤。建成想借马伤人，故意对世民说：“这是一匹难得的烈马，能跨越数丈涧谷，你骑术精湛，试试如何？”

李世民不知底细，跃身上马，猛追野鹿，飞奔途中，那马忽然仆倒，幸亏李世民反应迅速。不待马仆倒，就飞身跃出数尺。世民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又飞身上马，不料那马又接连仆倒两次。这样三仆三跃，面不改色，一点事情也没有。世民已明白是怎么回事，朗声对身旁的人说：“生死有命，暗算如何能轻易致死！”建成、元吉把这话添油加醋的密报李渊，李渊大怒，责备世民说：“天子自有天命。不是谁想得到就能得到的，你怎敢以天命自谓！”世民情知被人进了谗言，急忙脱帽叩头请罪，口称冤枉。高祖余怒未消，正要发怒，黄门官忽报突厥犯境，前锋已抵幽州。高祖大惊，因为要仰仗世民破敌，便勉励世民一番了事。

建成、元吉见宫中无法除掉世民，还勾结地方势力对付李世民。一次，

高祖与世民、元吉出游，建成密告元吉通知死党庆州都督杨文乾起兵行事。元吉派尔朱焕、桥公山去庆州找杨文乾起兵进京。不料，尔朱焕害怕身泄招祸，中途返回向李渊自首。李渊大怒，一面亲召建成进见，将他拘禁，一面派司农卿宇文颖召见杨文乾，不料宇文颖是李建成心腹，他到庆州后，把详情告知了杨文乾，杨文乾见东窗事发，索性起兵造反。李渊忙召见世民说：“杨文乾事奉建成，恐怕有很多人响应。你亲自率兵平叛，回来后我立你为太子。但建成是我的亲骨肉，我不忍心杀他。可改封他为蜀王。蜀地偏僻狭小，容易控制。他如果接受你的管治，就保全他的性命，如若反叛，你制服他也十分容易。”

还有一次，李世民随高祖到齐王府，李元吉命人暗中埋伏，想趁机杀死李世民，但李建成投鼠忌器，害怕李渊在旁，恐怕事情不成，反而获罪，才又作罢。

另一方面，李建成、李元吉还利用李渊的宠妃张婕妤、尹德妃在李渊面前诽谤李世民。她们因为与李世民有矛盾，就死心塌地的为太子效命，与李世民作对。

这一时期，“太子令”、“秦王令”、“齐王令”与高祖的诏书并行于世，下属机关不知该何去何从，便只好以到达的先后次序为准。

一次，李世民因淮安王李神通建立大功，就赐给他几十顷良田。谁知张婕妤的父亲也看上了这块良田，便由张婕妤说情，高祖把它赐给了张父，李神通认为秦王手令在先，因此拒绝退田，张婕妤就在高祖面前诽谤李世民。李渊大怒。几日后，他对裴寂说：“世民长期领军在外，被那些人调教坏了，再也不是我昔日的孩子了。”从此对李世民不如从前信任了。

还有一次，秦王府幕僚杜如晦骑马经过尹德妃父亲尹阿鼠家门时，突然被尹氏家奴扯下马痛打一顿。事后，恶人先告状，尹德妃在高祖面前哭诉：“秦王手下人凶狠暴横，竟欺凌我的老父。”李渊不分青红皂白，对李世民大加训斥。无奈李世民如何辩解也无济于事。

世民每每进宫，见众多年轻美貌的嫔妃伴着李渊，想到早死的母亲，不禁泪流满面。李渊很不高兴，嫔妃们也趁机陷害世民，对李渊说：“四海升平，陛下及时行乐及养生之道，但秦王却时常独泣，分明是憎恶我等！万一陛下千秋之后，恐怕我们不为秦王所容。太子仁孝慈顺，如果陛下把我们托付给他，则定会保全。”

李渊听到很不痛快，逐渐疏远了世民，而日益亲近建成、元吉。

唐朝初年，突厥兴兵，朝廷一片慌乱。有人对高祖说：“突厥屡犯关中，无非是为了抢掠美女财帛，如果烧毁长安，迁都他处，突厥就不会来犯了。”

李渊听信谗言，准备烧掉富庶的长安，逃往秦岭，并且已派人去踏勘新都。他以为这样一来，突厥人抢不到财物，就不会再来了。这个愚蠢的方案得到了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的赞同。

李世民知道后，竭力劝阻。他说：“蛮夷自古就是中原的灾难。陛下英明贤德，拥有百万精兵强勇，所向披靡，怎么能因小小的突厥骚扰边境就决定迁都避敌，岂不让世人耻笑！请给我几年时间，我保证让突厥臣服。”

李渊听世民说得有理，才取消了迁都计划。决定派李世民领兵征剿，建成惧怕世民征讨成功，势力更大，功高震主，威胁其储位，急请二妃在高祖面前挑拨说：“突厥虽不断骚扰我边境，但只要送给他们一些财物，他们就退兵了，而秦王托词带兵御敌，实际上是想趁机独揽兵权，为篡夺皇位作准

备，请陛下明察。”高祖竟然听信谗言，废除派世民带兵征讨之议。

杨文乾造反后，李渊派李世民征讨。同时，高祖的宠妃一再在他面前为建成开脱。高祖经不起“枕边风”的吹拂，再次改变主意，仍命建成回京师留守，不再追究他的谋反之罪，把李建成的当诛之罪说成是兄弟不和，责令“痛改前非”了事。待李世民平叛回来后，高祖再不提易储之事。

张、尹二妃还经常说服高祖改变有利于秦王的事情。李渊得到世民饮毒酒的事情后，亲自前往问候，对世民说：“当初提议起兵的是你，削平群雄的也是你。我本打算立你作世子，但你坚辞不受。建成是你大哥，又作太子多年，我不忍心废他。你们兄弟始终不和，一起挤在京城，难免会发生冲突。你到洛阳去住吧，陕西以东的地方归你统辖，可以悬挂天子旗帜，使用天子礼仪。”建成、元吉知后大惊。认为这一决策无疑纵虎归山。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高祖百年之后，恐怕无法驾驭。赶紧进宫请二妃进谗。高祖耳软，又一次食言，再不提让秦王守洛阳之事。

李世民屡次征讨突厥，每战必胜，威名远扬。秦王名望越高。建成等感到威胁越大。急欲除之。张、尹二妃加紧进谗，诬陷秦王对高祖怀恨在心，图谋不轨，不断挑拨秦王与高祖的关系。齐王元吉亲自出马，对高祖说：“秦王当初攻克洛阳时，盘桓不归，并散发财物树立个人威信，图谋造反”。意欲置秦王于死地。高祖虽没同意，但已对秦王产生疑忌。此时恰逢边关急报，李渊听从建成建议，命元吉带兵，借机剥夺秦王兵权。并欲将秦王部下精锐尉迟敬德、程咬金、秦叔宝、段宏志等干将及卫队一同带领出征，彻底解除秦王的武装。还准备在为齐王元吉饯行时，在昆明池暗埋伏兵，扑杀秦王。情况万分紧急。

李建成、元吉以为万无一失。岂知秦王也并未酣睡，他收买了众多耳目，甚至太子的心腹玄武门禁军首领也为他所用。对太子、齐王的所作所为明察秋毫。他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表面上不动声色。秦府老臣心急如焚，力劝秦王先下手为强。

李世民深知到这时太子、齐王已与自己不共戴天。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非但自己的身家性命不保，而且历尽千辛万苦开创的大唐基业及自己宏大的政治抱负都要毁于一旦，唐朝天下恐无宁日。尽管骨肉相残，是他于心不忍的。但高祖长期为奸党妖妃所惑，日益昏愤，一再听信谗言，不辨忠奸，以致树奸诛良。若一味的依靠高祖裁决恐怕不但不能明善恶、正朝纲，而且还可能黑白颠倒，后果不堪设想！至此，秦王对高祖的幻想完全破灭。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秦王在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及敬德等忠良的激励和推动下，终于作出果断抉择，决心以天下社稷和千秋大业为重，不拘小节，诛奸除暴，正纲纪而安天下。

公元626年6月3日，李世民进宫朝见高祖，密奏太子、齐王淫乱后宫，坏纲辱父的丑行和蓄意谋害自己的歹心。他痛哭流涕，谓高祖道：“儿臣扪心自问，毫无对不起兄弟的地方，而他们却千方百计地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儿臣蒙枉，无别陛下，黄泉之下也耻于与这样的叛逆为伍！”高祖大惊，一面安慰秦王，一面通知太子、齐王明日早朝，弄个究竟。

此时不动，更待何时，与其坐而待毙，不如拼死一搏。秦王决定先发制人。玄武门是长安宫城的北门，是内廷警卫驻扎的重地，是出入皇宫的必经之路。秦王事先已买通守卫玄武门的禁军统领、原太子建成的心腹何常。公元626年6月4日晨，秦王事先率敬德等在这里埋下伏兵，待太子、齐王经

过此地时趁机下手。

后宫张婕妤已将探听到的重要情报密告建成。元吉也劝建成以防万一，早作准备，称病不朝，静观局势变化。但建成依仗内有嫔妃相助，外有禁军森严戒备，谅秦王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不听劝告，携齐王元吉径赴早朝，直奔玄武门。

二人行至临湖殿，正欲到太极殿早朝，忽然发现情况有异，立刻调马而逃，但为时已晚。秦王世民纵马赶上。齐王元吉情急之下连发三箭，均被秦王躲过。秦王搭弓放箭，正中建成咽喉，建成翻身落马，当即毙命。齐王拨马欲逃，被敬德赶上，手起刀落，人头落地，东宫护卫见主子被杀，也无心恋战，四散逃命。

这就是“玄武门之变”。

高祖李渊久等不见三子上朝，正在海池与嫔妃泛舟取乐，忽见敬德仗剑而入，大惊失色。忙问何事？敬德说：“太子与齐王作乱，秦王已发兵诛杀。恐惊圣上，特命我来护驾。”

高祖见事已至此，也无可奈何，只好一切听秦王处置。

三日后，高祖下诏，立秦王为太子，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太子决定。

公元 626 年 8 月 9 日，李渊退位，李世民登基，就是唐太宗，年方 29 岁。太宗即位后，选贤任能、广开言路，励精图治，终开中国一代盛世——贞观之治。使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走向顶峰。唐太宗也被后人誉为“中国历史上贤明的皇帝之一”。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

唐朝初年，由于多年战乱，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土地大量荒芜，各地灾害频繁，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突厥等不断犯境，唐朝统治者尚无暇顾及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因此太宗继位时，战争创伤仍到处可见。当时全国人口不到 300 万户，仅相当隋朝鼎盛时期的三分之一。黄河两岸到处荒草茫茫，千里不闻鸡犬之声。因此，唐太宗即位后，缓和社会矛盾，稳定民心，医治战争创伤就成了当务之急。

唐太宗亲眼看到，强大富足的隋朝，仅在短短的几年就大厦倾倒了，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使唐朝基业牢靠久远，成了唐太宗时经常思考的问题。为了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公元 626 年 10 月，唐太宗亲自主持了关于“自古理政得失”的辩论。面对百废待兴、千乱待治的局面，大乱之后能否“大治”？群臣纷纷发表意见。许多人表示疑议，认为大乱之后，恐怕老百姓不易教化，太宗本人也没有信心。只有魏征对此充满信心，他说：“长期安定，百姓安逸骄奢，不易教化。如果经过多年战乱，老百姓生活困苦，反而容易教化。这就像饥不择食，渴不择水一样。”

大臣封德彝反驳说，上古人心淳朴，自夏商以来，世风日下，不可教化，因此才有秦的严刑酷法，汉的重用霸道。他骂魏征是小小书生，不识时务，空谈误国。

魏征据理力争说：“上古黄帝诛蚩尤、颡顛灭九黎、商汤放暴桀、武王伐酷纣，天下都曾大乱，但后来不都出现太平盛世了嘛！如果说古人品德高尚，后世逐渐堕落，那么今天的人们岂不都成了鬼魅，国君还如何治理呢？”封德彝被说得哑口无言。

太宗觉得魏征说得有理，便决定教化治国。

唐太宗亲历隋亡的经过，经常以秦、隋速亡为鉴，讨论思考如何才能不重蹈亡隋的复辙。他曾对大臣说：“隋文帝时，一年天下大旱，收成很坏，但文帝却吝惜钱财，不赈济百姓。到了隋末，仓库里积储的粮食足用 50 年。结果炀帝看到天下富足，便奢侈无度，结果导致了亡国。由此可见，积蓄太多岂不成了坏事？”因此，他总结说：“治理国家，重要的是积德重民心，而不在于大力搜刮。粮食储备只要够预防天灾就可以了。如果子孙后代贤明，自然可以保天下；如果子孙不肖，富足反而可以使他奢华，亡国灭家。”“当初平定长安时，宫中美女珍宝到处都是，但隋炀帝却仍不满足，依旧广造行宫，四处搜刮；依仗富强而东征西讨，穷兵黩武，徭役无时，因此弄得民不聊生，结果激起百姓反抗，最终亡了国，自己也遭到杀身之祸。看来福善祸淫，皆由人定。‘国君如舟，百姓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作为天子的，只要仁慈道义，能够约束自己，不扰乱百姓，就不会被百姓抛弃了。”

“治国好比栽树，只有不触伤根须，枝叶才能丰茂。为君之道，一定要让老百姓能够生存。如果为了自己而损害百姓，那就像割大腿上的肉去喂肚子，肚子饱了，人也死了。”

正因为唐太宗认识到了这些道理，所以他登基初期一直兢兢业业，小心治国，体察民情，严于律己。

贞观初年，关中、关东连续三年发生水旱灾害，百姓饥荒，卖儿卖女。唐太宗吸取隋亡之教训，唯恐由于灾害而激起民变，就下令开仓赈民。有些

州县把赈粮一户户送到灾民家中。饥荒过后，家家都有余粮。太宗还命令皇家府库开支金银，赎回灾民卖掉的儿女，送回家乡，与亲人团聚。而且他还命令朝廷紧缩开支，裁减冗员。

唐太宗非常注重农业生产，时时注意不违农时。他说：“凡事都须务本。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而从事衣食生产则以不失时节为本，作为国君，切不可贪婪而误了农时。”

一年，河东万泉县喜降春雨，县狱中被关押的几十名犯人，也被临时放回家及时播种。

一次，太子要举行加冠礼，礼仪官说二月有黄道吉日，建议二月举行。太宗考虑到二月是农忙季节，便决定改到秋后农闲的十月举行。

经过隋末农民战争后，出现了大片无主荒地，人口流散严重，这不仅影响农业的复苏，而且直接影响朝廷的收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高祖曾颁布均田令。但由于皇室内争激烈，均田制未得到认真贯彻。贞观年间，太宗继续推行均田制，即按人分给一定数额的口分田和永业田。为了解决有些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太宗极力鼓励农民迁往空地荒地较多的地区，并规定在那些地区占田超过定额不作违反律令论处，移民垦荒者，还可减免租税，免除徭役。为了保障均田令的顺利执行，唐太宗严惩阻碍均田的官员。

在实行均田制的基础上，唐初实行新的赋税制度租庸调制，租就是按人丁缴纳的田税。庸即徭役，不愿服徭役的，可交纳一定数量的布绢代替，叫做庸，也叫纳绢代役。调是户调，即按人丁缴纳一定数量织物和棉麻。这种新法，虽不能从根本上减轻农民的负担，但对农民的剥削大大减轻了，“纳绢代役”还可以使农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这样，农民得以生活下去，社会生产逐渐复苏了。

由于当时天灾不断，太宗一面奖励垦荒，一面安抚流亡，按灾情轻重来减免赋税徭役，防止滥用民力，劳役无时。

为了发展生产，太宗还采取赎回外流人口，奖励嫁婚生育、释放宫女、兴修水利等利农措施。

经过多年努力，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得到了提高，农业生产有很大恢复。国家安定，农民安康，粮价也由唐初的一斗米一匹绢，跌至斗米二三钱。

由于太宗体察民情，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不误农时，在他统治时期，“海内康宁”，“国泰民安”，再次出现太平盛世。

唐太宗曾问魏征：“君主如何才能‘明’，如何才是‘暗’？”魏征回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意思是说，各方面的意见都能听，就不至于被蒙蔽，那样就能做到贤明。如果只信某一方面的意见则糊涂昏庸。魏征还举了例子说，秦二世只听赵高，隋炀帝只听虞世基，结果天下大乱了，自己还不知道，最终导致了灭亡。他说：“国君能够听到下面的声音，接受各方面的意见，就不会被蒙蔽，下面的情况就会及时反映到上面来。”太宗听了非常赞同。

为了鼓励各级官吏大胆进谏，每当有人奏事时，太宗便放下架子，非常和蔼，诚恳听取意见。即使大臣们的意见不合他的胃口。他也让他们认真陈述，即使明显错误的，他也让其讲完。

他曾对大臣萧瑀说：“我小时候就喜欢弓箭，搜集了几十张好弓，以为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弓了。谁知拿给弓匠看，他们却说都不是好弓。尽管木质很硬，但纹理都不正，因此发箭都不直，我这才明白自己对弓的认识还

不够。我是用弓箭平定天下的，对它的认识还不透彻，何况天下事情繁多无比，我如何能样样明白呢？”

他对大臣说：“人要想知道自己的模样，要借助镜子，国君要想知道自己的过错，必须依靠忠臣。我深居宫中，天下的事情不能样样看到，所以委任百官做我的耳目，如果君主以为自己什么都好，臣下也不规劝，怎能不出差错呢？君主丢了国，大臣也自身难保，隋炀帝就是教训，你们一定要尽职尽责，经常提醒我。如果我有哪里不对之处，大家一定要直言不讳！”

他刚作皇帝不久，下令要杀一个人，司法官孙伏伽进谏说：“依据大唐法律，不应处此人死罪，既然定下律令，陛下就该带头执行，怎能滥用酷刑呢？”太宗接受了这个意见，而且重赏了孙伏伽。有人不满，认为孙作的事非常平常，不该重赏。太宗说：“我即位以来，还没人规劝过我，孙伏伽是第一个，理应重赏。”

公元630年，太宗下令修复洛阳宫殿，准备自己到洛阳游玩时使用。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反对。说：“修复洛阳宫殿并不是最紧要的事情，当年隋炀帝修建洛阳，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如今战争刚结束，元气还没有恢复，财力还不如隋朝，却要先修洛阳宫殿，岂不是比隋炀帝还残暴吗？”太宗听了很生气，说：“你认为我还不如隋炀帝，那么我比夏桀、商纣如何？”张玄素说：“陛下如果不停止这项工程，一定会落得与隋炀帝、夏桀、商纣一样。”尽管这话听起来十分刺耳，但太宗经过认真考虑后，还是采纳了张玄素的意见，立即下令停工，并重赏张玄素。

有几次原来秦王府的老部下犯了罪，太宗想照顾他们，魏征知道后，坚决反对。他对太宗说：“过去秦王府的人，现在官在要职的很多，如果人人都仗着老关系为非作歹，那么把法律放在什么位置，以后的事情还怎么办？”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话，对求情的人说：“我过去只是秦王府的主人，现在是天下君主，不能偏袒老朋友。”

根据唐朝的法律，18岁以上的人才服兵役。但太宗登位不久，有人建议不满18岁的男子，个大身壮的也可以服兵役。但魏征坚决反对，扣下诏书不发。太宗多次促，魏征只是不理。太宗十分生气，把魏征叫来训斥道：“个大身壮的男子（不满18岁的），其实可能是奸民故意隐瞒年龄，逃避兵役，叫他们当兵有什么不好，你为何扣住诏书不发？”

魏征说：“用兵在精而不在多。陛下常说要以诚信待天下，使臣民都没有欺诈的。陛下岂不闻‘不能涸泽而渔，不能毁林而猎’？如果把那些身强力壮、不到18岁的男子都抓来当兵，以后从哪里征兵呢？陛下明明规定年满18岁的成年男子才能当兵，现在不满18岁的男子也要应征，岂不是言而无信吗？”太宗大惊，问“我何时失信了？”魏征说：“陛下刚即位时曾下诏说：拖欠官府东西的，一律免除，但官吏们还在催收，这是不是言而无信？关中免除两年租调，关外免除劳役一年。如今已服了劳役或交了租赋的还要应征，这是不是言而无信？陛下一向说以诚信待人，为什么征兵时会怀疑百姓作假？这是以诚信待天下吗？”太宗被问得哑口无言，半晌才转怒为喜说：“过去我总以为你太固执，不通达政理，现在听你议论国家大事，讲得如此符合情理，我才明白自己的过错有多大！号令失信，百姓无所是从，如何能治好天下呢？”

从此，唐太宗更加信任魏征，提升他为太子太师，并奖励一个金瓮。

一次，太宗到洛阳，中途休息昭仁宫，因饭食不好，大发脾气。魏征当

面批评道：“炀帝就常因责怪百姓不献美食，结果大事铺张，以至亡国。陛下应吸取教训，克勤节俭才是。”太宗大惊，说：“若不是你，我如何能听到如此中肯的话！”

贞观中期后，唐朝经济更加繁荣，政治也很安定，朝廷大臣都尽力歌舞升平。只有魏征不忘过去的艰苦，给唐太宗上奏章，指出太宗十个方面的缺点，希望他警惕，保持贞观初年的作风。唐太宗把这奏章写在屏风上，早晚阅读，引以为戒。他对魏征说：“我如今知道了自己的过错，如果不改正，如何有脸再见你！”

由于魏征处处为国家着想，对太宗敢直言出谏，因此太宗也怕他几分。一次太宗正在玩鸟，见魏征进来，赶紧把它藏在怀里。魏征假装没看见，向太宗奏事时，故意拖延时间，等他离开时，鸟已经被活活闷死了。

公元634年魏征病死。太宗十分悲痛，亲自为他写了碑文。他伤心地说：“用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知得失。魏征去世，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正因为唐太宗能虚怀纳谏，大臣们都敢于直言进谏，所以他在位期间政治比较开明，经济繁荣。

唐太宗不但善于纳谏，而且善于用人。他当国君后，广延人才，贞观朝臣中，有隋炀帝的重臣，也有起义军的领袖，有王世充的将领，也有太子建成的谋臣。太宗用人不计前嫌，只要有贤德才能，都予以重用。

尉迟敬德是太宗最得力的干将。他先是隋朝大夫，后做刘武周的偏将。后来，刘武周被李世民打败后，他和寻相一起投降唐朝。不久寻相等叛唐。一些唐将怕敬德也叛变，主张把他杀了，以绝后患。太宗不同意，亲自释放了他，并把他请到家中安慰他说：“大丈夫意气相投，竭尽忠心，不必计较这些小事，我不会听信谗言冤枉好人的。”并送给他很多金银，敬德十分感动。

太宗登基前，李建成想拉拢敬德暗杀世民，遭到断然拒绝。无论建成威胁利诱，敬德始终没有屈服。后来，在玄武门事变中，敬德立了大功，被封为吴国公。

李靖，隋末在马邑作副长官，他发现李渊有谋反迹象，亲自到江都向炀帝告密。此人能文能武，很有军事天才，李世民不但没有杀他，而且让他做了宰相。在平定突厥与群雄的战争中，李靖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太宗时期最有才能的军事统帅。

屈突通，先后在河东和潼关等地坚决抗击李渊。李渊占领长安后，他仍忠于隋朝。后来他成了唐太宗的重要将领，是二十四功臣之一。

马周，本来是“山东布衣”，出身低微，很不被人瞧起，因为替何常写了二十条建议，被太宗发现，交谈之后，发现他很有治国才能，非常高兴，就任命他做了监察御史，后官至中书令，主持朝廷大政。

魏征，原是太子建成部属，曾力劝太子早除秦王。李世民恨透了他。玄武门事变后，太宗把他召来，沉着脸问他：“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关系？”左右大臣都替魏征捏把汗，但魏征从容答道：“当时我在太子手下做事，自然忠于太子。先太子如果早听我的话，便不会有今日之祸。”大臣们都为魏征担心，没想到太宗重他的人品和才能，不但没杀他，反而委以重任。日后，魏征成了不可多得的重臣。

唐太宗反对靠亲戚关系、靠资格用人。他常对大臣们说：“君主一定要

大公无私，才能使天下人心服。官员不论职务大小，都应选用贤才。不应该按关系的远近，资格的深浅，来决定官职的大小。”公元627年，唐太宗论功行赏，把他的叔叔淮安王李神通排的不很靠前，李神通很不服气，对唐太宗说：“太原起兵时，我第一个响应，赴汤蹈火，不辞劳苦，房玄龄、杜如晦无非舞文弄墨，从未冲锋陷阵，功劳却比我大，官职却比我高，这很不公平。”唐太宗认真分析了李神通的才能、功过，并且与其他功臣作了比较之后说：“叔父是国家的至亲，我怎能不信任您呢？但治理国家不能以私废公！”一席话说得李神通满脸通红。

唐太宗当了皇帝后，早年的一些部下因为没有得到提升，很不满意，常发牢骚说：“我们多年来鞍前马后，出生入死，反倒不如太子、齐王的属下！”唐太宗对他们说：“选拔人才，不能分新旧、先后。如果新人贤明，旧人愚笨，难道能舍弃新人去用旧人吗？你们发牢骚，是因为没有为国家着想。”

唐太宗还知人善任，注意舍短取长。大臣房玄龄不善于处理事情，但善于出谋划策，杜如晦短于处理琐事，却善于“剖断如流”。唐太宗注意到了这些细节，分别委任他们合适的官职，使他们得以发挥自己的长处，互相弥补，人称“房谋杜断”。

唐太宗对于少数民族的首领也十分尊重。打败突厥后，少数民族首领归服的，他都封给适当的官职，一视同仁。唐太宗死后，在长安的各少数民族首领和官员，无不痛哭流涕。很多人按照自己民族的习俗，剪掉头发，割去耳朵，刺伤面孔，表示对唐太宗的哀悼和忠心。由此可见唐太宗的用人之道和民族政策的正确。

此外，唐朝还采取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大批出身低下的读书人也都有机会进入政府机构，更巩固了统治基础，有利于国家统一。贞观初年，一次科举发榜，太宗看到新考取的进士排成长队走来，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由于唐太宗“任人唯贤”，知人善任，各个阶层中各种各样的人才都聚集到他的周围。在这些有才能有卓识的文臣武将的辅佐下，唐太宗不但平定了中原，降服了夷狄，而且实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这些人物各显其能，为唐朝的强大、繁荣作出了贡献。

唐太宗即位不久，一次在与大臣们讨论周朝为什么长达八百年，而秦朝只有短短的三十年时，他说：“周朝注意行仁义，秦朝总是靠强力，所以长短不同。一般而言，打天下也许可以靠强力，守天下靠强力是不行的。”因此他主张把政治搞得稳定一些。

他强调官吏必须廉洁、清明。不仅注意中央各部门的官员，同时注意地方官员。他把官吏的名字都写在屏风上，谁做了好事、坏事，都注在下面，作为升降的依据。

唐太宗治国，非常注意发挥各个部门的作用，让他们各负其责。他曾说，“隋文帝因为不信任大臣，结果什么事都由他一个人裁决，尽管十分辛苦，但事情却未必能办好。四海之内，人多事繁，千头万绪，如果什么事都由皇帝一人裁决，那怎么行呢？怎能不出差错呢？日积月累，错误越积越多，能不亡国吗？信任有才能的人，把事情交给他们办，自己站得高高的，严格监督，岂不更好？”

设置不同机构，本来就是为了防止差错。人的意见自然会有所不同，只要是为了公事，都应该提出来。但有的人护短，别人一提意见就怀恨在心。

有的人顾惜面子，怕得罪人，明知事情不能那样办，但却不提出来。不愿得罪一个人，结果却害了百姓。这实在是亡国的大毛病，各位大臣一定要谨慎！一定要一心为公，知无不言，切不可众口一词，不负责任！”

唐太宗对大臣严格要求，同时也非常关心和尊重他们。君臣关系相对要融洽得多。一次李世 暴病，据说用皇帝的胡子灰可以治好，唐太宗就割下胡须，烧成灰给他作药。古时候，人们把头发和胡须看得像生命一般，十分贵重，至高无上的皇帝肯这样做，那是对臣下的无尚关怀。李世 感动得头都磕出了血。

魏征病重时，唐太宗多次派人到他家探问，送医送药，还派人住在他家，随时向他报告病情。并同太子一道去看望魏征，当面答应把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魏征出殡那天，他望柩痛哭，还亲自给魏征写了碑文，大臣竭尽心力为他效力，与他关心、体贴臣下是有很大大关系的。

唐朝刚建立的时候，社会秩序很乱，各地盗贼众多，严重威胁了唐政权。他心里清楚，出现盗贼，是由于赋役繁重，官吏贪污勒索，百姓饥寒交迫所致。因此，他听从魏征的建议“对百姓要讲仁义”，因为严酷的刑罚只会激起民变，隋炀帝就是前车之鉴！于是他下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 与法官一起修订法律。

对于刑法，唐太宗主张不要过严，但必须公正。他说：“人死不能复生，因此刑法要宽一些。凡是死刑，一定要经过三次复核才能执行。”并让长孙无忌把这一条写进法律。

对于法令条文，唐太宗认为条文太多，太复杂，容易被钻空子。他说：“国家的法令，必须简明准确，不能一种罪有多种处理办法。条文多了，主管的人不能全部记熟，这样就会出漏洞，想判的轻些，就引用较轻的条款，想判的重些，就引用较重的条款，这样岂不就坏事了吗？”

公元 637 年，新的法律修订完成了。这就是有名的《唐律》，它共分十二篇五百条，内容周详、简明，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法学遗产。

新法制定后，唐太宗要求官员们都要依法办事。他说：“法律不是为一个人的，是天下人的法。不论什么人，都要守法，没有任何例外。”

高甌生是唐太宗的老部下，资格很老。一次李靖率军讨伐吐谷浑，高甌生误了行期，他不但不服罪，而且还诬告李靖谋反。太宗经过调查后，根据《唐律》，判高甌生流刑。有人为高甌生求情，说他是秦王府老臣，即使犯再大的罪也应宽恕，何况是小过呢！唐太宗说：“他有罪依法理应处罚，如果赦免了他，那国家的法律还如何执行？自太原起兵以来，功臣多了，如果宽大了高甌生，那么别人犯法我如何处置，要法律还有何用？我并没有忘记故人和功臣，但不能因此赦免他。”

唐太宗的姐姐长广公主的儿子赵节，犯了大罪，长广公主亲自向太宗磕头求情，恳求太宗宽大赵节。太宗边还礼边说：“仇人有功也要赏，亲戚有罪也须罚，这是天下的至公，我不敢违抗，不能宽大外甥，实在对不起姐姐。”结果太宗还是依法处置了赵节。

唐太宗时期，政治清明，国泰民安，这是与唐太宗为政有道、赏罚分明分不开的。

唐太宗即位时，民族矛盾已十分尖锐，各族之间兵戎相见，战争时有发生。其中对唐朝政权威胁最大的就是突厥。

隋初，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他们趁隋末战乱之际，大肆扩张，成为雄

踞漠北、力控西域、势倾中原的强大军事力量。李渊太原起兵时，为了消除后顾之忧，曾向东突厥称臣纳贡。

唐朝初年，突厥不断犯境，使唐朝统治者极为忧虑。因此，迅速解除突厥威胁，妥善处理民族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唐政权的存亡和国家的统一，而且也成了社会经济发展与各族人民的迫切要求。

唐太宗决心消除这块心腹之患。他即位不久，即加紧练兵，为反攻突厥创造条件。唐太宗亲自在显德殿指挥操练。有人向太宗进言：“法律规定，严禁带兵器出入皇宫，你这样做，万一出点差错，是非常危险的。”太宗说：“帝王视四海为一家，我与他们推心置腹，开诚相见，如何能无故猜忌身边的将士呢？”将士们听后都非常感动。在太宗的督导下，人人奋发，刻苦训练，数年之后，就训练出一支精锐部队。

这时，突厥内部发生内讧，加上天灾不断，实力大大削弱。唐太宗见时机成熟，于公元629年11月，派李靖为大将，率十几万大军，兵分四路，讨伐东突厥。次年春天，大破突厥军，俘虏了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从此，北部边境得到安宁，西北边境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往日益密切，为唐朝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公元635年，唐太宗派李靖率军大破吐谷浑。公元639年，唐太宗派侯君集又打败了高昌，并把高昌划归唐朝版土。从此，完全打通了“丝绸之路”，加强了西方各国同唐朝的往来，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增进了中西人民间的友谊。

正当唐朝繁荣发展的时候，西部边境的吐蕃日益壮大起来。赞普（意思是雄壮强悍的男子）松赞干布非常羡慕唐朝的文化，要和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公元634年，他第一次派使者到长安访问。唐太宗很快派使节回访。从此，汉藏关系日益密切。公元640年，松赞干布向唐朝求婚，太宗把文成公主送到西藏与松赞干布成婚。

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许多先进技术，对西藏地区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今仍为汉藏两族人民所称颂。

唐太宗由于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因此在中国各民族中树立了极高的威望。周边民族纷纷臣服，尊唐太宗为“天可汗”。

由于四境平安，民族关系融洽，因此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的不断交流和发展，对祖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为盛唐文化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同时，盛唐文化也对亚洲各国乃至世界的前进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中国的丝绸、茶叶等深受各国人民的欢迎。中国的造纸术对世界文化事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汉唐文化对朝鲜、日本的影响更甚。强盛的大唐帝国在当时的世界上获得了极高的威望。这一切都与唐太宗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有作为的皇帝，杰出的封建政治家，他对我国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尽管他统治后期，不如早年那样谦虚谨慎，虚怀纳谏，而且也不太注意节俭和关心百姓疾苦。他晚年日益喜爱颂德之声，夸饰之誉，逐渐骄傲起来，甚至一意孤行，发兵辽东，对社会经济、人力物力造成极大损失。但纵观他一生而论，功著而过微。

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治国措施。在他统治时期，社会比较安定，政治较为清明，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人民安居乐业，阶级矛盾比较缓和，各民族团结和睦，中外交流较为频繁。国内一派

繁荣景象，“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中国已经发展成当时世界上最富强最昌盛的封建国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太平盛世。因为，唐太宗的年号叫“贞观”，所以，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为“贞观之治”。

